

臺灣學者「魏源研究」述評

楊晉龍*

一、前言

清代魏源(1794-1857)是現代研究晚清學術的熱門人物之一^①，考其倍受重視的原因，主要恐怕還是基於晚清不斷的戰敗以來，關心中國生存的學者對所謂「現代化」的熱忱追求，以及懼怕中國被世界「邊緣化」，而有深切「走入世界」期待的結果。不過筆者所以會注意魏源的理由並不在此，主要是筆者在二〇〇二年向國科會申請通過了一個「佛典與詩經學研究」的計畫(NSC91-2411-H-001-021-)，此一研究計畫的主旨乃在於探討歷來《詩經》的詮解者，使用「佛典」或「佛家觀點」解說《詩經》的實際情況。魏源在道光八年(1828)游杭州後開始「溺佛」，因而晚年「遁入佛門」，是相關研究者眾所皆知的常識，部分學者還因此特別強調魏源的佛學思想及其作用與影響^②；然而根據筆者主持點校《汪喜孫著作集》之際的相關紀錄，發現魏源「崇佛」的現象，很有可能比學界公認游杭州的時間還早（資料詳下文），而魏源又正有《詩古微》之作，當然也就「合理地」將其列入研

* 楊晉龍，本所副研究員。

- ① 羅志田和葛小佳就認為今日一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關注的多是魏源、馮桂芬、鄭觀應、王韜、黃遵憲乃至孫中山等受西潮影響較多的口岸人物」；又說「口岸人物當然無疑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主線之一」，至於像康有為、章太炎等所注意的也只有他們的「維新」或「革命」，像他們對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影響，其實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見羅志田、葛小佳：〈跨世紀的啓示：從章太炎到古史辨〉，《東風與西風》（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230-231。
- ② 如翁廷瑞就說魏源「用儒佛的心性，來作淑世之說；晚歲禪淨兼修，實是他救世精神的另一表現。他與龔自珍的禮佛，實亦開晚清思想家的先驅，……楊文會亦深受魏源經世、佛學之影響，……故魏源之影響，不可謂不大」。見翁廷瑞：《魏源的政治思想》（臺北：聯亞出版社，1983年），頁212。

究計畫必須探討的對象之一。不過後來並沒有在《詩古微》中發現明顯引錄佛家相關典籍或思想的現象，但在探討《詩古微》的內容之際，就一般研究者的正常程序，當然必須先瞭解魏源的生平與思想背景，以及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中是否有此一預設「研究計畫」所需要的相關資料？因此投入了一些時間收集魏源生平與相關研究的資料。本所林慶彰與蔣秋華主持的「晚清經學研究計畫」，今年的重點正好落在「湖湘學派」上，魏源又正是「湖湘學派」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因此乃將前此為「佛典與詩經學研究」計畫而收集到的資料，改寫成爲此文，利用國科會補助的出國經費到湖南長沙發表。故此文雖非專門探討「佛典與詩經學」直接相關的著作，然實際上則是國科會「佛典與詩經學研究」計畫的副產品，此即寫作此文的緣起。

魏源字默深，清代湖南省邵陽縣金潭鄉魏家段沙洲上（今隆回縣司門前鎮學堂灣村二組沙洲上）人^③，乾隆五十九年（1794）生，少時曾於邵陽「愛蓮書院」（嘉慶十二年〔1807〕在學）、長沙「嶽麓書院」（嘉慶十八年〔1813〕在學）兩處讀書；嘉慶十九年（1814）入京，曾問學於胡承珙（1776-1832）、姚學瑛（1766-1826）、劉逢祿（1776-1829）等諸儒。道光二年（1822）舉人、八年（1828）游杭州寓錢東甫宅並從學釋典，且延請法師講《楞嚴》、《法華》諸經、九年（1829）捐貲爲內閣中書舍人、二十四年（1844）成進士。曾館於李宗瀚（1769-1831）、楊芳（1770-1846）家；先後入賀長齡（1785-1848）、陸建瀛（1792-1853）、裕謙（？-1841）等人之幕；並與陶澍（1778-1839）、姚瑩（1785-1852）、林則徐（1785-1850）等交往。後任揚州興化縣知縣、高郵州知州等官，咸豐三年（1853）楊以增（1787-1855）劾其遲誤文報而被革職，或因爲病聾之故而拒絕復職^④。於是僑居興化，開始刪訂

③ 按：筆者與蔣秋華、蔡長林、吳仰湘、馮曉庭、吳銘能、車行健等，曾於2003年9月12日早上到湖南魏源的故居考察，此一地址蒙管理員鄒連余先生告知，謹此致謝。筆者考察費用係由國科會「佛典與詩經學研究」計畫（NSC91-2411-II-001-021-）下之款項支付，謹此致謝。

④ 譚獻（1830-1901）說他在二十歲左右曾往杭州僧舍拜訪魏源，當時魏源「病聾不能深談」，筆者因而懷疑魏源辭官不仕，恐與「耳聾」之關係爲大，研究者全都接受其子所謂「遭遇坎坷、世亂多故」的堂皇說辭，作爲唯一的解釋理由，頗值得商榷。批評魏者誇大其父事功，所記或有不實者，參見李瑚：〈魏晉《邵陽魏府君事略》箋釋〉，《魏源研究》（北京：朝華出版社，2002年），頁866註9所論。譚獻又說他：「論河主故道、論澱主減價票運、論漕主海運，今皆如其言，可謂『先識』。」見〔清〕譚獻著，范旭倫、牟小朋整理：《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卷5，頁124。

平生舊作，並專心禮佛，自稱「菩薩戒弟子魏承貫」；繼到蘇州，最後游於杭州。咸豐七年三月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於杭州僧社，享年六十四歲，葬杭州南屏山之方家峪^⑤。

魏源嘉慶十九年隨父至北京時，曾與汪喜孫（1786-1848）相識往來；道光九年入北京應試，當時與劉逢祿等同居於宣武門街因劾魏忠賢（?-1627）而被殺的明臣楊漣（1572-1625）祠之南，又再度與汪喜孫相逢，並成爲鄰居，且與龔自珍（1792-1841）、王護齡、陳潮（1801-1835）、丁泰（?-1830）、錢協和（?-1830）、徐松（1781-1848）、吳鼎臣（1765-1830後）、吳贊（?-1829）等其他鄰居，結爲論學之友。汪喜孫對魏源學術的認知是：「治三家《詩》、歐陽夏侯《尚書》」；平常讀書的觀察則是：與龔自珍並「喜談內典」，此文雖寫於游杭州之後，唯據汪喜孫敘述中，並無突兀改變的驚異語氣推測，則前此龔、魏恐當已多談「內典」了^⑥。再者汪喜孫於道光十七年（1837）寫給朝鮮學者金正喜（1786-1856）的信中，也曾稱美《詩古微》「爲貫串條理」。另外汪喜孫於道光十八年（1838）將他所收集的金正喜與另一朝鮮學者權敦仁的來信，題以《海外墨緣》之名而予以刊布，兩位朝鮮學者在書中曾特別提到，朝鮮的學者也聽聞魏源精於三家《詩》，並發表評論說：「默深之學，於近日漢學門戶又進一格，以西京今文之學，直接七十子遺言微義，亦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者也。」^⑦朝鮮學者亦以爲魏源之學，較當時流行的「漢學」更進一步，可以經由「今文學」而直接聯通到比較接近孔子時代的先秦七十子，以經世致用爲主要訴求的「實事求是」之儒學。上述記載，今之治魏源學術者，或猶有未加注意者，故特別提出供有心者參考焉。

魏源著作據相關學者統計，包括刊本、抄本等總共有三十八種，其中《說文擬雅》、《董子春秋發微》、《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明代兵食二政錄》、

^⑤ 生平諸說參考黃麗鏞：《魏源年譜》（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與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爲討論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9年）兩書相關之論。

^⑥ 翁瑞廷曾根據魏源〈夏夜東李希康二首（時希康方讀禪書）〉一詩，說他「早年曾涉禪書」，見翁瑞廷：《魏源的政治思想》，頁3。亦可爲此一推論提供旁證。

^⑦ 汪喜孫與魏源相關之事，參見〔清〕汪喜孫著，楊晉龍主編：《汪喜孫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點校本），上册，頁128-130、頁179-182、頁203-204、頁253；下册，頁1190、頁1204-1205等處。

《孫子集注》、《淮南鹽法輕本敵私議》等六種有〈序〉無書；另外《高子學譜》、《春秋繁露注》、《墨子注》（或作《墨子章句》）、《說苑注》、《六韜注》、《吳子注》、《易象微》、《大戴禮記微》、《論學文選》等九種則僅存書名；佚失者另有《公羊春秋古微》、《會典提綱》、《纂評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屯防志》、《子思子章句》、《曾子章句》、《論語孟子類編》、《遼史稿》、《海運全案》等書。據主編《魏源全集》的大陸學者夏劍欽之研究統計，魏源現存著作依成書時間先後及經、史、子、集四部之先後次序排列，則有：《書古微》、《禹貢說》、《詩古微》、《古微堂四書》、《蒙雅》；《元史新編》、《聖武記》、《海國圖志》、《淮北票鹽志略》；《老子本義》、《淨土四經》；《古微堂文集》、《古微堂詩集》、《皇朝經世文編》等^⑧，考察這些現存與佚失書籍的屬性，即可見魏源著述能力之強與學問涉獵之廣，不過或許就是因為著作過多，因而不免出現「疏漏」而遭到後人的指責。

魏源相關的學術研究，使用的基本原典文獻資料，大約已盡如上文所述。中外學者根據這些資料，或論其經學特色、或言其史觀與史識、或探其佛道思想、或考其文學成就；或綜合而探其思想淵源與特色、究其經世之志與實際主張、析其學術與經世觀之影響及價值等等。臺灣學者有關魏源的研究或評價，當然與其他地區的學者相同，無法完全脫離早期如皮錫瑞(1850-1908)、章太炎(1868-1936)、梁啟超(1873-1929)^⑨，或者還可包括李慈銘(1829-1894)等相關的反面與正面評價的論述

^⑧ 魏源著作主要參考林美蘭：《魏源《詩古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頁7-8；翁瑞廷：〈魏源重要著作知見錄〉，《魏源的政治思想·附錄》，頁239-241；夏劍欽先生：〈《魏源全集》各書版本概說〉，《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3年第5期（總387期）等諸文而成。

^⑨ 章太炎、梁啟超相關的評論，將於下文提及。皮錫瑞《經學通論》至少在16處提及魏源。標題中明列魏源之名者：〈書經通論〉中有〈論劉逢祿魏源之解《尚書》多臆說不可據〉一條；〈詩經通論〉中有〈論魏源以〈關雎〉、〈鹿鳴〉為束紱王臆說不可信三家初無此義〉、〈論三家亡而《毛傳》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駁辨明快可為定論〉、〈論朱子不信《毛序》亦有特見魏源多本其說〉、〈論《樂記疏》引《異議》說《鄭詩》非必出於三家魏源據以為《三家詩》未可執為確證〉等四條，見〔清〕皮錫瑞：〈書經通論〉，《經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頁97-99；〈詩經通論〉，頁12-13、頁15-18、頁27-29、頁31-33等處。皮氏指出魏源批評《毛序》的意見多源自朱子，肯定其駁斥以《毛傳》為詮解《詩經》唯一確解的偏頗、所論有「近是」、「近通」與「深切著明」者等正面評價外；也有批評魏源解說《尚書》「立論太果」過於武斷、所為新解「皆不盡善」；解說

影響^⑩。再就研究的實際表現而言，相對於現在大陸學者的研究，臺灣學者在數量上固然遠遠不及^⑪，投入的研究人力也極其有限，但由於兩岸長期分隔的關係，在

《詩經》亦多創新解而大誤、不知三家之異而「欲強合《魯》、《韓》為一」、《詩序》「三家所無者，皆以己意補之為〈序〉」、「好創新說」「非實事求是之義」、「未能篤守古義，且多武斷」等等負面的批評。引文見〈書經通論〉，頁99、頁104；〈詩經通論〉，頁13、頁18、頁24-25、頁27、頁32-33、頁35、頁38、頁45、頁68等處。引錄皮氏之說者，如：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收入《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頁193-242，其中註87、註104、註105、註108等處，均註明引錄之文出自皮氏《經學通論》；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頁161也引有〈詩經通論〉之說。

- ⑩ 根據由雲龍(1877-1961)蒐集的李慈銘《日記》中涉及讀書與評論相關文字的記載，李慈銘除閱讀過魏源的《皇朝經世文編》(1863年3月10日、1886年12月16日)、《古微堂集》(1881年4月27日)、《夷舶入寇記》(1881年6月27日)、《海國圖志》(1885年11月17日、1887年1月13日)等書外，並至少在閱讀評論其他8本書之際連帶提到魏源。李慈銘評論的主要觀點是：肯定魏源以實用為考慮的儒學「經世」主張，但認為魏氏在經學與史學方面的根柢與成就有限。例如說《海國圖志》「體大思精，真奇書也」；並提到「當魏氏此書初出時，使朝廷先加意此事」，密令地方官員申儆人民，則遏止天主教傳播之「事猶可為」。讀《古微堂集》後說魏源「為經世之學，其文筆兀莽」，但「於經學實無所解，乃大言自矜；……猖狂無忌，開口便錯。其史學亦甚疏，駁之不勝駁」；又說他「力尊《公羊》，扶翼《解詁》；卑《穀梁》為輿阜，比《左氏》於盜賊，蓋幾於非聖無法，病狂喪心，而所看之書不過十餘部，所治之經不過三四種，……用力尤簡，得名尤易，此人心學術之大憂，至今未已也」。說他「才粗而氣浮，心傲而神很，恥於學無所得，乃遁而附於常州莊氏」，作《書古微》與《詩古微》，謂馬、鄭、毛公皆「俗學」，所言「臆決竅談，無待駁辯」；又說魏源除考據多誤謬外，「其餘文字之疏，引據之失，不及僕指。又詆謫先儒，指斥近獻，尤多違戾悞復之言，亦不足以辨」。結語則認為「其經世之學，議論多明通，其說理亦有精語，是《集》必傳於後」。讀《皇朝經世文編》謂魏源「博學有霸才」，稱是書體例之善，以為大旨「欲救儒之不適用於世」，然「去取不免左袒於宋」，而欲合性理、文獻、經制、考索諸學為一，謂「其志甚大，用亦甚要」；而惜其多采程晉芳等一類猖狂不學者的愚誣之論，李慈銘考其故，則以為「魏氏未窺漢學塗軌」，因而不知名物訓詁之於政道與人心，關係甚大等等。引文見〔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縕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528、頁1134-1142、頁1205-1207。由於李慈銘的《讀書記》在1961年即由臺灣的世界書局出版，因而其某些肯定魏源觀點的正面論述，即被現代研究者引入。如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4年），頁163即引有李氏稱美魏源《海國圖志》之言。此條稱美之文又見於王先生：《魏源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頁34「道光六年」條下「注5」。李氏對《海國圖志》的批評，也見於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頁89。

意識型態上、學術環境上、研究方法上等，均不免產生某些差異，表現在研究成果方面，也就自然會有所不同，透過對某些較深入研究論著的介紹分析，對爾後的研究者，或許可以有部分的助益。此文討論的「臺灣學者」之研究成果，係以居住於臺灣而具有中華民國之國籍者所發表的論著為對象，不包括香港、澳門、大陸的內地學者；也不包括日本、韓國、美國等外國學者與華裔學者的著作。因此像劉廣京(1921-)與周啓榮的論著；陳耀南(1941-)的著作與演講稿；陳其泰(1939-)、馬亞中(1957-)、張錫勤(1939-)、夏傳才(1924-)、路新生、陳鵬鳴和朱漢民(1954-)等等的著作^⑫，雖在臺灣發表，但不列入計算討論；王家儉(1925-)雖然在大陸發表^⑬，則亦加以收錄。

⑪ 根據筆者的初步統計，截至2003年6月為止，大陸、港、澳學者涉及魏源的相關研究文獻資料，至少有：專書29部、博碩士論文9部、期刊論文371篇、專書論文與篇章109篇、會議論文75篇、網站論文2篇、報紙文章47篇等。外國學者與華裔學者（僅日本、美國、韓國的資料）的論著至少有：專書與博碩士論文3部、期刊論文42篇、專書論文與篇章8篇等。實際的論著篇目，參見拙著：〈魏源研究論著目錄(1894-2003)〉（未刊稿）。筆者本已將此稿交主編《魏源全集》的夏劍欽先生，做為《魏源全集》的〈附錄〉；唯2003年10月28日夏先生以Email告知《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認為：「報刊、論文集或專書中的論文和篇章，既難收全網盡，又有冗贅之嫌，為免生枝節和節省篇幅，《全集》還是以只附主要論著書目，不收論文篇目為好。」因而未能刊登此稿，雖然如此，但夏先生對學術的用心，還是相當值得敬佩。

⑫ 如：〔美〕劉廣京：〈十九世紀初葉中國知識分子——包世臣與魏源〉，《第一屆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年）；〈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與〔香港〕周啓榮合著：〈《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上）（1986年6月）。〔香港〕陳耀南先生：〈魏源與中國現代化〉，《書目季刊》第13卷第4期（1980年3月）；〈魏源的文學理論〉（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1年3月12日「專題演講」）。陳其泰：〈魏源——開一代風氣的愛國史家〉，《中國古代史學人物（下）》（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馬亞中：〈修辭新奇，不失古格的魏源、姚燮詩〉，《中國近代詩歌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張錫勤：〈魏源的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夏傳才先生：〈魏源《詩古微》〉，《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路新生：〈論魏源學風〉，《孔孟學報》第70期（1995年9月）。陳鵬鳴：〈魏源《聖武記》初探〉，《中國書目季刊》（1995年9月）；〈試論今文經學對魏源思想的影響〉，《孔孟月刊》第34卷第7期（1996年3月）。朱漢民先生：〈魏源論道〉，《中國文化月刊》第255期（2001年6月）。

⑬ 王家儉：〈魏源的海權思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辦「紀念魏源誕辰2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1994年9月湖南邵陽。

本文進行探討的程序，基於方便讀者閱讀之前先瞭解作者評論觀點內涵的考慮，故首先陳述作者對前賢相關研究的方法與評價的反省檢討；然後纔進行論著篇章內容的實質性陳述與說明；最後做成結論，整理出一些或許可以再繼續思考或探討的問題，提供學界參考^⑭。至於臺灣學者相關研究的〈論著目錄〉，則作為「附錄」附於正文之後。

本文在評價的立場上，固然同意在理想上有最終答案存在的可能，同時也認同研究過程中「客觀」態度與「整體」關照的必要性，但不認為研究者能夠確實做到純粹的客觀與真正整體的瞭解，也就是並不認為任一研究者具有獲得最終「唯一答案」的可能，因而尊重各種不同立場者的研究表述，比較重視的毋寧是「答案如何獲得」的主觀立場與論證分析等問題的瞭解，因而表現在研究評價上，就形成積極上肯定「應該還有其他可能性」的答案；消極上同意「答案不會僅有一個」的狀況。文中評述對象之際，「述」的部分，本就是一種「瞭解」的功夫，因而會儘可能順著作者的立場，將其研究重點與成果展現出來，不可否認地，其中必然也有筆者主觀立場的存在；有關「評」的部分，當然是帶有價值判斷的「批評」，進行評判之際，除資料性等一類的「硬傷」外，大致上即根據前述的「前預設」下判斷，就是在尊重作者主觀立場的前提下，提出其他可能的答案，但並不積極主張此答案必然能夠取代原有答案，成為「真理性」的唯一正確答案；故評判之目的不在取代，係以提供相關研究者不同的思考方向為重點，此需先加說明者。

二、研究與評價的反思

魏源面對當時國家財用匱乏、兵戰迭起的時局，利用其在內閣中書任內觀書的方便，蒐輯清朝前期有關爭戰的豐功偉業事蹟，成《聖武記》一書^⑮，以激勵當局重用人才，解決國家內部的困境；其後在面對英國帝國主義侵略而清朝一再戰敗，

^⑭ 湖南大學吳仰湘教授認為行文應先敘述研究成果，然後再陳述作者對研究成果的反思意見，比較具有連貫性，讀者也比較容易閱讀、瞭解。不過筆者覺得應該先讓讀者知道作者「前理解」的觀點，這樣在閱讀過程中纔比較能夠瞭解作者陳述研究成果之際的取捨標準，讀者因而可以判斷作者敘述所可能呈現的「視野限制」與「偏頗訛誤」，因此沒有接受吳教授的意見。雖然如此，但還是非常感謝吳教授願意撥冗審閱拙文，並提供相關意見的盛情。

^⑮ 此處敘述原有訛誤，蒙北京大學漆永祥教授指正後改正，謹此致謝。

林則徐戰勝卻被發配到伊犁(1841年)的事實之後，於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受林則徐之託，開始編著以「知彼」為始，而以「勝彼」為理想目標的《海國圖志》。在〈敘〉中他非常明確地說明著作此書的宗旨是：「為以夷攻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①⑥}亦即學習或借用侵略者的方法與策略以對付侵略者，以協助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外在困境。

魏源此種「師夷」而向「夷人」取經的主張，實在是一種被迫而不得已的思考行為，這對絕大多數一向以「天國」自居，習聞孟子所謂「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①⑦}，因而輕藐「夷狄」的當代中國傳統士大夫而言，可以想見「師夷」的觀點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如何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面對當時人的這種文化心理上的劇烈衝擊，如果不是潛意識中早已不自覺地以西洋文化為標竿，被西洋文化「殖民」而不自知，以致缺乏本我文化自尊與自信，而能比較客觀地站在當時中國人的立場，以及他們並無法預知世界發展，和世界的發展還有其他可能性存在的角度來論，則也許就不至於出現那類過度推崇魏源等一類「向西方學習」者，而對那些不贊成者過度否定的偏見了。例如蕭功秦(1946-)因為倭仁(1804-1871)於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1867年3月20日)上奏，反對在教習英、俄等外文的「同文館」內，再增設「天文算學館」，並禮聘「洋教師」來教導西方科技知識的提議，理由是不必因為「求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①⑧}，這當然是站在中國傳統「師生」一倫的文化本位保守立場的一種正常性反應，蕭氏卻以此而大作文章，竟然用「表現在對西方列國及西方人的盲目虛憍態度上」之言加以攻擊^{①⑨}，這類「先驗」的站在「現代西方」立場的批評方式，蕭氏並不是唯一的一位，蕭氏的譴責語氣也還不算激烈，用較之蕭氏更加激烈的言詞，抨

^{①⑥} [清]魏源：〈海國圖志敘〉，《魏源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影印點校本），上册，頁207。

^{①⑦} 見《孟子注疏·滕文公上》，[清]阮元等編：《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影印清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第8冊，卷5下，頁4a，總頁98。

^{①⑧} 有關倭仁反對引進「洋教師」一事的緣由與後果，參見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165-186比較詳細的分析討論。

^{①⑨} 蕭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國近代士大夫與西方挑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臺灣1987年影印本），頁67。蕭先生此書站在以現代西洋發展狀況為基準的前提下，對當時所謂「儒家困境」的一般性「論述」頗具功力，的確相當值得重視與參考。不過從論述中也可隱約感覺到蕭先生那股「中國傳統不可能開發出適應現代世界路向」及「現代西方路向乃是中國必需學習跟進的唯一走向」的隱藏在心理上的強烈「預設」；另外蕭先生如果能夠對行

擊那些反對向西方學習者的意見，充斥在多數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或歷史的文章中，可見現代研究者在評論那些反對「向西方學習」者的偏頗態度。

魏源的今文經學與那些倍受現代人推崇的「經世」觀點、海防等「洋務」主張，其中不少主張確實產生過實際的效用，但必然也存在一些問題。就比較客觀的學術角度而言，如章太炎等一類，站在反滿的大漢族沙文主義立場所作的「夸誕好言經世」、「妖以誣民，誇以媚虜」等等無謂的批評²⁰；以及多少帶有門戶之見的江浙學者劉師培(1884-1919)等一類，所謂「權門顯宦，請謁繁興，才情通侈，以高論駭俗」、「僅身倡優之列」、「飾巧智以逐浮利」等單方面批評魏源人格的意見，自然不必過度當真²¹。但前述倭仁「拒絕向西方學習」的反應，當該代表當代大多數士人的意見，略從常識性上去理解，就可以斷定當時同情魏源「向西方學習」主張者，絕對不會占多數²²。蕭功秦的激烈批判語句，代表民國以來，那類熱愛中國而以追求中國富強為唯一要求，即使因此導致中國不成其為中國也在所不顧，因而痛恨中國還不能富強、還無法成為世界強權之列的「民族主義式」學者的焦慮情緒。擁有此類情緒的學者，在此種「不平」心理引導下，比較容易以「後見

文之際的揶揄諷刺語氣稍作修飾，效果應該會更佳。本文這種以「中華本位文化」、「整體環境考量」為前提的思考觀點，當然與蕭先生等一類以「世界文化為本位」者思考的觀點有別。有關「中華本位文化」與「世界文化為本位」觀點的需要與問題，有興趣的讀者或許可以參考孫文(1866-1925)在1924年2月10日演講中，有關「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論述與批評。見《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三講》，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訂：《國父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年），第1冊，頁25-34。

- ²⁰ 見章太炎：〈清儒〉、〈學隱〉，收入朱維錚先生點校：《檢論》，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冊，卷4，頁476、頁481。又見《遺書重訂本》，《章太炎全集》，頁158。
- ²¹ 見劉師培：〈清儒得失論〉，《左龔外集》，收入《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1936年本），下冊，卷9，頁7b-8a，總頁1538-1539。無錫錢基博(1887-1957)稱美魏源為「發聾振聵」的「豪傑之士」，但也說他「大言經世而行或不掩」「以華士騰口說」，未能為篤行之醇儒，顯然對其人格亦有意見。參見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1940年成書，1985年校訂），收入劉夢溪先生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572、頁582所言。
- ²² 例如：翁瑞廷即謂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下，魏源的「影響力甚微」，見《魏源的政治思想》，頁208；又如主張唯有執行李鴻章「徹底以西法求自強」的道路，纔能救國的大陸學者石泉，就認為「倭仁為理學名臣，其所持論，蓋極可代表當時士大夫之見解。」見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頁11。

之明」的「先知者」姿態，抱持高於古人一等的「優越」心理，憤怒地指責當時絕大多數站在「中國本位」發言的古人，嚴厲詬責他們昧於「世界」大勢，不能馬上放棄自己的一切，提早向西方學習的冥頑愚昧，所以他們必須為「陷害」中國而「導致」中國積弱負責的譴責怨氣的發洩。這種完全不為對方的立場與當時的先天限制著想，一味地站在「後見之明」立場上所進行的譴責、揶揄、諷刺的研究方式，除了發洩作者以及其同道者的不滿情緒外，就學術研究而言，恐怕並不太容易表現出什麼重要的意義與貢獻²³。因為「死人」是永遠的「沉默者」，這些過時的「頑固分子」當然無法像現代人一樣「聰明」，明確地「看到」或「瞭解」後代歷史演變的實際狀況，當然也無法提出後代「不肖子孫」比他們更沒志氣的事實，來為自己的堅持做有效的辯解。從這個角度來看，則現代如蕭功秦等一類的學者，那種缺乏尊重對方「抗辯」權益的譴責揶揄方式，豈非只是一種「虛假命題」、一種特定「意識型態」的宣傳、一種將對方「建構」為「腐敗」的學術霸權的策略應用而已，然則其研究成果，豈非僅對那些早就抱有強烈相同「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的人，有加強其信仰的作用外，在客觀求實的學術價值與學術貢獻上，恐怕還有某些值得再加商榷之處！

實則如果願意儘量拋棄從現代已有的實際表現，而「逆推」溯源的單線思考與研究方式，願意儘可能地從當代的情況，「順向」的多元思考加以考察，則當時士大夫對時局的反應：無論是對世界局勢幾乎毫無所知，因而自以為持守中國的傳統本位文化，即能對抗外來侵略的「頑固保守派」；或因比較瞭解世界趨勢，看出西洋侵略者的科技優勢，因而自覺地主張向西方學習，以便能更有效的對抗外來威脅的所謂「進步開明派」，兩者在「富國強兵」以抵抗侵略者的最終目標上並無不同，只是主張達成目標的途徑有別而已：一個主張「向內尋求」的本土文化之開發；一個主張「向外尋求」的異國文化之引入。如果重就當時實際的歷史時空來看，其實也很難馬上就可以「鐵口直斷」的確定那一種主張，占有絕對正確而有效的優勢。從學術多元的角度而言，這種相同時代針對相同議題而提出不同觀點的互

²³ 大陸學者陳勝淼就曾批評過現代研究者，過度貶抑那些在不同程度上反對「向西方學習」的人物，「人們常常情緒化地把他們斥之為『頑固派』、『反動派』，簡單地否定之，似乎沒有深究的必要。……甚至嚴重影響我們對進步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深入研究。」見李細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序〉，《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頁3。

相爭勝，可說是一種相當正常且必要的論爭，現代人因為時過境遷而握有在時空上「後進的利益」的優勢²⁴，因而很容易從現在已經既成的歷史事實加以「逆推」，並且幾乎無法避免「單線」思考的限制，然後理所當然的「認定」或「規定」歷史的發展僅可以有現存的這種唯一的發展模式，幾乎忘記就魏源所處的時代來說，歷史的發展可具有許許多多的可能性！魏源的「師夷」主張，即使是最好的主張，也不過是其中比較符合現代人需要的一種「主張」而已！即使沒有經過什麼繁複的論證，中國傳統士大夫關心社會國家安危的潛在心理，應該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因而與魏源同處在那種被「外夷羞辱」情境中的士大夫，絕不可能無動於衷，而僅魏源一人「天縱英才」的注重「經世」，其他士大夫都昏聩無知。實際上，「經世」的要求，應該是當時關心國家安危的士大夫們的集體共識，「如何經世」的問題，也就是前述「向內尋求」或「向外尋求」的不同主張，恐怕纔是爭執的焦點。這個不同立場的爭辯，一直要延續到「新文化運動」以後纔「定格」，也就是「向西方學習」最終成爲「經世救國」的主軸。現代人生活在「向外尋求」主軸早已確定的時代，研究相關問題之際，不免會受到此一主軸的影響，稍一不小心，馬上就會陷入單一正確化的唯一立場內，於是除了「向西方學習」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就完全被消解掉了。現代學者由於受到此種「研究視野」的限制，於是基於刻意或無意的疏忽，當在做學術發展的歷史溯源工作時，就很可能在不知不覺間，把那些不符合我們這些「聰明睿智地」現代人所認定的學術發展規律的學者之主張，當成「走向現代」過程中擋路的「大石頭」²⁵，於是過度譴責、揶揄或諷刺也就難免出現了；

²⁴ 所謂「後進的優勢」是國立臺灣大學前校長孫震先生解釋像臺灣此種非開發的「後進國家」，在發展經濟的競爭過程中，可以不必再經過長期的研究發展，而迅速取得「先進國家」的知識與技術的運作方式，經濟學家稱之爲“the catching-up hypothesis”（迎頭趕上理論）。筆者借用來說明居於時間序列後端的研究者，對研究對象不知的事務，已然有確切的答案，因而就可以很快的下判斷確定何種觀點或主張正確而有效，這就如同「後進國家」可以不必再經過研究發展的程序，而輕易取得「先進國家」成果的情況一樣。相關的說明參見孫震先生：《邁向已開發國家》（臺北：三民書局，1990年），頁57-59、頁88、頁99、頁113-114、頁159、頁191-192、頁204、頁211等處的討論說明。

²⁵ 例如在潛意識中認同「向西方學習」文化發展方向的大陸學者吳方（1949-），就認爲導致「尋求『經世致用』的思想」如魏源等「爲改革鼓吹的思想流派」，所以出現「幾十年曲折蹉跎」的原因，就在於「保守派的『堅冰』」很難打破。見吳方：〈保守派、洋務派、早期維新派〉，《末世蒼茫——細說晚清思潮》（香港：中華書局，1993年），頁118。

相對地也會有意或無意間，不僅過度地誇大那些符合我們現代人「規定」的學術發展規律學者的主張，甚至還會把這類學者某些在當代具有共識的「普遍」主張，當成其所推崇者個人特殊的「獨見」，因而不當地誇大其在當時所具的「絕對」重要性與對後世重大而唯一的影響性，例如美國芝加哥大學的Susan Mann Jonesc 和 Philip A. Kuhn 兩人在一九七八年所說：「魏源是十九世紀各主要思想潮流之集大成者；他不但是經世思想家、今文學家，他也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當時社會所遭遇種種變遷。」的意見²⁶，即是一顯例。恐怕這類相近的稱美讚佩的論述當中，有不少只是我們現代人的「想像建構」而已，並不是真正的歷史現實！比如朱維錚(1936-) 就有不同的意見，朱先生認為是「林則徐的悲慘遭遇造就了魏源的先驅名聲」，並以爲「湖南小城三家村塾師出身的魏源，猶如法國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描寫的于連，懷著羨憎交織的情結，不擇手段地追名逐利，並以極端實用的眼光看待一切學問，可以毫不困難地改變見解。他對西洋情形原無研究，但在鴉片戰爭敗局已定後，僅用一百天便拿出了五十卷的《海國圖志》，從此以『夷務』專家現身。……單看這部書的效應，主要也不在於向人們提供了域外世界的新知，而在於其中發表的『籌海三策』，所謂『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三策都不新鮮，相反每策在前都曾有人提出。……魏源實際是在迎合滿清君主的虛僞心態，助長天朝至上論的幻覺。……使人們以爲它可能真是『制夷』的良策。從這一點來說，《海國圖志》刊行後引起了把手段當作目的之效應，也就是人們越來越不諱言有必要『師夷長技』，是理所當然的」²⁷。實則所謂「集大成」也可能是「剽竊」了當代許多人的創見而成，更可能是許多人相互影響下所形成的

²⁶ [美] Johk King Fairbank 編，張玉法主譯，黃克武、潘自蓮譯：《劍橋中國史(10)：晚清篇》(臺北：南天書局，1987年)，上册，頁175-176，此說當是受到齊思和的影響而生，詳下文所言。不過誠如黃愛平(1955-) 所說，面對當時「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與「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現實問題」，事實上是「許多爲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和掌管有關事務的朝廷官員，以及許多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相繼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和思想主張」，魏源不過是其中之一，即使是比較特出一個，衡以魏源當時的身分與地位，固然在某些「討論」或「敘述」層次上具有部分影響力，但在實質層面上所能造成的影響，恐怕也有其限度，美國人的推崇恐怕有點過度誇大了。黃愛平之論見所著：《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頁279。

²⁷ 朱維錚先生：〈導讀：晚清的「自改革」與維新夢〉，朱維錚先生、龍應臺編著：《維新舊夢錄：戊戌前百年中國的「自改革」運動》(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頁47-48。

一種「風氣」，而非某個人的一己之「獨見」，另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念²⁸，當然也就會導向非「師夷」不可的方向，中國的近代歷史豈不就是如此發展？因此「向西方學習」的「師夷」主張，焉得不成為現代多數學者所認定，必然而唯一的歷史走向！然則根據前述的論析，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否也可以追問：是魏源等一類主張「向西方學習」者具有「先識」？還是這批人「誤導」了中國發展的方向呢？若能瞭解此種「先驗預設」的不足與問題，則對學術界有關魏源研究的評價是非，或許比較不會過度「跟隨」前賢、比較可能保持一些清醒與求實的眼光及態度。

三、臺灣學者研究介述

臺灣學者有關魏源的研究，根據初步的統計，截至西元二〇〇三年六月為止，共有專書四部；學位論文（包括已改寫出專書者）七部，其中二部為博士論文；學位論文中專章涉及魏源者有七部，其中一部為博士論文；期刊論文四十二篇；專書中專章或論文十四篇；學術會議論文一篇；報紙文章四篇。詳細的論著目錄參見「附錄」所載²⁹，唯其中不少文章，僅是一些有關生平、交遊的雜聞或抄錄傳記資料等一般性的介紹性雜文而已³⁰，故以下僅擇其中較具代表性者加以討論。

臺灣現代學術環境之建立，與日本殖民時代學術關係甚淺，可說完全是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自大陸引進，因此在進行有關魏源研究的溯源之際，亦不得不稍觸及

²⁸ 賀廣如即認為魏源在京師與諸士子、學者等知識分子間不斷的切磋互動、互相影響的腦力激盪，對清季經世學風的盛行，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見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頁177-178的討論。

²⁹ 統計數量，根據張惠淑：〈魏源研究論著目錄〉，《經學研究論叢》第4輯（1997年4月），頁299-333；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之〈徵引書目〉，頁271-281。以及「中央研究院圖書館館藏目錄」網站、「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網站、「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網站、「香港中文期刊論文索引」網站、日本「東洋學文獻類目」網站、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NDL-OPAC」網站、「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西文書刊目錄檢索」網站及「雅虎」網站等蒐尋所得資料而成。

³⁰ 方淑妃：《魏源的史學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頁2-4；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頁3-9，兩處均有回顧性的文獻探討，對部分論著的內容大要與問題，均有粗略的評述，可供參考。

清末民初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甚至某些臺灣學者如錢穆(1895-1990)與胡秋原(1910-)，其較早期的論著，實亦發表於大陸；兩岸交流後，除學者來往切磋外，大陸資料更是臺灣學子必須參考的文獻之一。雖然在兩岸交流後，交集的部分逐漸增多，差異性逐漸減少，但由於意識型態與治學方法、學術交往對象與學術視野上，存有不少的差異性，因此希望透過此一研究分析，可以在研究的淵源、關注的議題焦點、研究的方法等方面，提供一些不同的訊息，有助於爾後進行魏源相關的研究之際，可以朝向更真實與更深入的方向上前進。

現在所知臺灣最早論及魏源的文章，當係洪禱(洪棄生，1867-1929)在一八九四年五月所寫的〈跋魏子默深書後〉，主要慨嘆魏源具有「雄略」，本「可以有為而無所表現」，以為「以彼其才、其志，使得閱歷兵間，實練其識；……其造就固未可知，吾決其不在駱文忠秉章、胡文忠林翼之下也」^③。以文學之想像，誇張魏源「可能的」成就，此洪氏借魏源以表達自己對國事之憂心，感嘆當時人才之難得，當與魏源實際之表現毫無關係。洪氏之論或可代表清代以來「改革派」學者評價魏源的共同心聲。其次則是胡秋原一九四三年九月發表在大陸《新中華》雜誌的〈近百年思想界之兩先驅〉一文，主要是討論龔自珍和魏源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觀點亦不出梁啟超諸人之外。

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以後，最早出現有關魏源的文章，是一篇署名「良知」者於一九五二年六月發表在《暢流半月刊》的〈記魏默深先生〉雜文；最早屬於學術研究形式的文章，應是王家儉一九六三年的碩士論文《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此文論題焦點集中在經世思想與海防思想上，王氏在其改寫出版的同著作〈前言〉中，表達了其研究的基本思考模式。王氏認為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有「外患的日迫與嚴重」與「國民的雪恥圖強運動」等兩大明顯的趨向，王氏認為魏源的「海防政策」，是中國在第一次外患後，頭一部雪恥圖強的方案。並以為這個「以國富兵強，充實海防為標的；以認識外情，師夷長技，講求外交，改良內政為手段」的方案，「為中國指出一條朝往近代化的道路」，此方案雖未能實施，但卻大大影響了「清末海防思想與洋務運動」；王氏以西方十九世紀出現的「進步」觀

^③ 洪禱：〈跋魏子默深書後（甲午四月廿一夜又草）〉，《寄鶴齋古文集》，收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洪棄生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第2冊，卷下，頁255-256。

念及以「向西方學習」作為標準，檢討造成中國近代悲劇的原因，以為「與其謂為西方勢力的侵襲，毋寧歸因於國人過為傳統所制約，而昧於進步的觀念；只知抱殘守缺，而不能開拓新的機運。事實非常明白，設使我國，誠能……大力展開廣泛規模的改革運動，隨時吸收西方國家的進步思想，技術與制度。並進而改善東西方的關係，使中國納入近代化的正軌。則因一時的小害，而轉為百年的大利。那麼鴉片戰爭的打擊，又何嘗不可以……對我國有所裨益？」此論與前述洪儒之文學想像式的慨嘆，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洪氏是個文人，王氏卻是個歷史學家。另外與洪氏有別的則是王氏比較站在「世界主義」的立場評論發言，故行文中頗有正當化西方侵略者的侵略行為，以及視中國受到侵略欺侮是一種自己「不知長進」，因而「咎由自取」的隱藏性的思想表現。王氏在文中首先探討形成魏源「海防思想」的背景，包括國內：對鴉片戰爭的反應；國際：世界大勢及魏源對西方的認識等背景。其次分析「海防思想」的內涵，包括：固守內河海口、結盟以戰、通商互市等三策。三則檢討分析「海防思想」在「議守」上「採取守勢」、「防守口岸」、「訓練士兵」的必要性；在「議戰」上採取「以夷制夷」、「以夷攻夷」、「師夷長技」、「不斷呼籲」的正當性；在「議款」上的「主張議款」、「改進關稅」的思想觀念等，王氏承認上述這些觀點，實係當代相關思想觀念的綜合反映，而非魏源一人所獨創。另則討論魏源與林則徐的關係，並特別強調魏源針對林氏處理鴉片事件瑕疵的批評，具有實際與學理上的必要與正當性。最後討論「海防思想」的影響：如「著述廣泛流行」、「多方影響學術」、「曾獲大臣推重」等；以及陳澧(1810-1882)「縱橫家奇談」的批評、姚瑩(1785-1852)惜其「未能為人所用」的推重與感慨、馮桂芬(1809-1874)「地理錯誤」和「款夷攻夷」的指責、左宗棠(1812-1885)的同道讚揚、郭嵩燾(1818-1891)的敬重與同情、張之洞(1833-1909)「開風氣之先」的推崇、譚嗣同(1865-1898)針對其書謂「朝鮮與琉球與海防無涉」的指責、梁啟超的多方面推重，以及流傳日本後，對佐久間象山(1811-1864)、吉田松陰(1830-1859)及梁川星巖(1789-1859)等等的影響^②。其〈結論〉則特別強調魏源

^② 根據日本學者圓了源(1920-)的歸納統計與分析，魏源的《海國圖志》傳入日本以後，產生的影響大概分為三種類型：一是以島津齊彬、川路聖謨、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等人為代表，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者。二是以安井息軒(安井衡，1799-1876)、賴三樹三郎等人為代表，主張「攘夷」者。三是以橋本左內、橫井小楠(1809-1869)為代表，由主張「攘夷

在中國近代史上「維新圖強運動先驅」的地位，由於魏氏思想主張未受重視，導致中國「近代化爲之遲滯約二十年之久的時光」。王氏歸納前人檢討中國不能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而導致「改革運動」失敗的原因有六：一則中國士大夫盲目的驕傲自大，以致虛懦成性，不能作知己知彼的檢討；二則中國士大夫過分的拘泥與保守；三則中國缺乏認真執法之人；四則中國的領導者貪戀富貴，缺乏勇猛犧牲的精神；五則中國士大夫階級害怕打破科舉作官的飯碗；六則晚清諸帝拘泥祖法，昧於時事，缺乏進步的眼光與偉大的氣魄。王氏最後檢討兩個阻礙中國進步的主要因素：一爲政治權力的偶像化，即君主專制權力太高，形成奉命行事的惡習，缺乏主動推行新措施與新事業的人才；二則知識權威的偶像化，即儒學主流思想因定於一尊，形成強烈的排他性，對任何新學說與新思潮均深閉固拒，因此新思想與新見解很難見容於世，更不可能造成風潮。所以說「辛亥革命的勝利，則不能不歸功於海外留學生的卓越領導」^③！而王氏此論之精神，實與齊思和(1907-1980)襲取改變梁啟超^④、王國維(1877-1927)等說法而成的論點同一思考方向。蓋梁、王二人論晚清

論」而轉向「開國論」者。見郭連友：〈鴉片戰爭與吉田松陰的思想形成〉，戶川芳郎先生古稀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日文化交流史論集——戶川芳郎先生古稀紀念》（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63-89，引文見頁67。

^③ 見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前言》與〈結論〉，頁1-2；頁185-188；以及其他相關涉及的章節。

^④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謂：「魏源著《詩古微》，始大攻《毛傳》及《大小序》，謂爲晚出僞作。其言博辯……且亦時有新理解。其論《詩》不爲美刺而作，……深合『爲文藝而作文藝』之旨，直破二千年來文家之束縛。又論詩樂合一，……皆能自創新見，使古書頓帶活氣。……魏書出而《毛詩》真僞成問題。」又以爲「龔（自珍）、魏（源）之時，清政既漸陵夷衰微矣，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輩若不勝其憂危，恆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自珍、源皆好作經濟談，而最注意邊事。……後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又說：「新興之常州學派……產生出一種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間考證學的基礎之上，建設順、康間『經世致用』之學。代表這種精神的人士龔定庵和魏默深，這兩個人的著述，給後來光緒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響。」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魏默深《海國圖志》……不純屬地理，……篇中多自述其對外政策，所謂『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師夷長技以制夷』三大主義。由今觀之，誠幼稚可笑，然其論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淨盡，則其在歷史上關係，不得謂細也。……書在今日，誠爲芻狗，然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見梁啟超著，朱維錚先生校注：《梁啟超論清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62、頁63、頁119、頁467等處。

學術，不僅將龔、魏並論³⁵，且有特別偏向於推重龔自珍學術思想影響的傾向。齊氏則反是，不但排除龔氏的學術影響力，反過來還特別推崇魏源的重要性與強大的學術價值和學術影響的作用，王氏之說近似於齊氏此一基本的思考模式。王氏完成於一九六七年首開魏源譜學細密研究先河之力作《魏源年譜》的〈譜前小識〉，謂魏源係「晚清極具影響力之學者，近代之先驅思想家。經學……承常州學派之遺緒，著《書古微》、《詩古微》、《公羊古微》、《董子春秋發微》等，力申今文，以張公羊之說，為康、梁變法思想之前導；史學地學，則旁徵博引，搜羅海內外資料，著《聖武記》、《海國圖志》等，歷述清初武功³⁶，推求盛衰之理，介紹

³⁵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說：「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喪亂之後，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源，……實學以興。雍乾以後，……士大夫得肆意稽古，……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咸以降，涂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攷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竊於其間得開創者三人焉：曰崑山顧先生、曰休甯戴先生、曰嘉定錢先生。國初之學創於亭林，乾嘉之學創於東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學，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開創者仍當於二派中求之焉。蓋嘗論之，……道咸以降，學者尙承乾嘉之風，然其時政治風俗已漸變於昔，國勢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憂之而不知所出，乃或託於先秦西漢之學，以圖變革一切，然頗不循國初及乾嘉諸老為學之成法。其所陳夫古者，不必盡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適中當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如龔璣人、魏默深之儔。其學在道咸後，雖不逮國初、乾嘉二派之盛，然為此二派之所不能攝，其逸而出此者，亦時勢使之然也。今者時勢又巨變矣，……蓋莫不推嘉興沈先生，以為亭林、東原、竹汀者儔也，……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錢、戴，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竊又聞之，國家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世變愈亟，則所以篤之者愈至。」見《觀堂集林》，收入《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第2冊，卷23，頁25b-27b，總頁582-586。觀察此文所論，與齊思和之文相較，即可見出齊氏抄襲而改變王氏之文的痕跡。由於王國維在「道咸以降」中並沒有明確指出誰是「開創者」，只說「當於二派中求之」，而在行文中嘗舉「龔璣人、魏默深之儔」為例，導致翁瑞廷有「王國維謂晚清學術，實啓於龔、魏」的誤說；翁瑞廷同時也因此種過度偏重魏源的觀點，對「一般人重龔自珍而輕魏源」的研究評價，大表不滿之意。見《魏源的政治思想》，頁22、頁70註23、頁210等處。

³⁶ 按：《聖武記》一書記事，除乾隆一朝外，更有遲至嘉慶18年(1813)以後者，此時離清朝開國已近一百七十年，王氏用「清初」二字，恐不甚妥當。此點因北京大學漆永祥教授之質疑指正，方注意及之，謹此致謝。

西洋歷史地理，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相倡導。其海防思想，不僅為清末談洋務者所必宗；流風餘韻，且及東瀛，於日本幕末維新志士，發生莫大影響」之論，與「咸豐七年」條下所謂「綜觀先生一生，倡經世以謀富強，講掌故以明國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邊防，策海防以言戰守。集前修之大成；開一時之風氣。繼往以開來，守先以待後，洵可謂一代之大儒」之說³⁷，也大致不離前述「獨重」魏源的基本思考模式³⁸。

齊思和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發表於《燕京學報》的〈魏源與晚清學風〉一文，對臺灣與大陸研究者影響甚大，觀多數論著的參考書目中，經常出現該文即可了知，為溯源之需要，故加以討論，以見臺灣研究者「先驗」結論，除王家儉外的另一原始來源。齊氏此文重在檢討中國士大夫的虛憍閉固，以突顯讚美魏源的進步先知。故文中除討論魏源的思想淵源與時代背景外，最重要者實在突顯加重魏源在學術與可能的經世實務上的重要表現，包括：具有致富強的經世思想；對漕運、鹽法、河工、兵餉等大有貢獻；究心當朝掌故，開治「清史」的風氣；創新邊疆與域外史地國情、海防的研究；不僅在今文學上有重大的成就，對清代今文學家以經術為政論的敘述方式，也具有倡導的重要作用與影響地位；另外魏源與講學諸友的切磋討論，也開創了一代的學術新風氣等等，可見魏源在各方面所具有的開創性與唯一性的地位與成就。〈結論〉更以為魏源「兼攬眾長，各造其極，且能施之於實行，不徒託諸空言，不愧為晚清學術運動之啓蒙大師」³⁹。齊氏之論與王家儉研究的判斷

³⁷ 王家儉：《魏源年譜》，書前及頁177。再則是書頁171「咸豐六年」條下所錄譚獻《復堂日記》之文，考《復堂日記》中實無此文，相近之記錄，參見本文註4所引，疑係抄錄他書之文而致誤；頁163「咸豐五年」條下王氏引錄〈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敘〉後云：「於此可見先生之懷抱矣，其以『古微』為其堂號，良有以也。」按：「古微」之號，朱彭壽（1869-1941……）謂係用陸龜蒙「子近於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之典而成，見〔清〕朱彭壽著，何雙生點校：《安樂康平室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4，頁228。又頁177之文有抄錄齊思和之論而未註明出處者。

³⁸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的「參考書目」中並無齊思和之文；《魏源年譜》則於「道光十七年」與「道光二十年」兩條下引用之，頁66、頁75。

³⁹ 齊思和曰：「有清三百年，學術風氣凡三變。……道咸以來，變亂疊起，國漸貧弱。學者又好言經世，以圖富強，厭棄考證，以為無用，此學風之三變也。其代表人物為魏默深先生。此三先生（顧炎武、戴震、魏源）者，皆集前修之大成，開一時之風氣，繼往開來，守先待後，繫乎百餘年學術之升沉者。惟自來言清代學術者……魏氏則或廁諸劉、龔之間，或附於文苑之末，皆以文士或章句之儒視之。……夫晚清學術界之風氣，倡經世以謀富強，講掌故

取向不謀而合，此一取向實隱含了過度「實用主義」的傾向，王氏可說是臺灣魏源研究最重要的專家之一，結合兩者在學術上之影響力，此單向偏頗之見，幾乎成爲爾後絕大多數臺灣與大陸及海外研究魏源者「潛意識」中所持守而不證自明的「共識」，或當作魏源研究必然的最終答案。

錢穆發表於一九三七年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專章論龔自珍，論魏源者則僅三頁多。文中稱魏源之學「初尚宋儒理學，後主今文」，說經「求微言大義，頗不具於傳注」，蓋「本主擺脫傳注直求經文，又主以躬行踐履求經文」；並謂其編著《皇朝經世文編》、《聖武記》、《海國圖志》諸書，「感切時變，有志經濟，而晚節仍以辨漢儒經學今古文名家」，最後評論云：「晚清今文一派，大抵菲薄考據，而仍以考據成業。然心已粗，氣已浮，猶不如一心尊尚考據者所得踏實。其先特爲考據之反動，其終匯於考據之頹流，魏、龔皆其著例也。」^④所論以其今文學之治學方法與流弊爲主。因此書「詳龔而略魏」，故又於一九八〇年發表〈讀古微堂集〉一文，以彌補前文討論之闕。該文首先承認晚清今文學「其主要人物，群推魏默深與龔定庵」，相對於前書之論，可窺見四十年來魏源學術地位日漸高漲之概。文中稱魏源於道光十一年(1831)編纂《皇朝經世文編》後，開始留心時務，「志在用世」。及「交遊日廣，濡染既深，乃始從事經學考據」，謂其學不在辨兩漢之今古文經學，實在辨乾嘉經學之無用，今文學之興固與魏氏關係密切，然若專以今文學家視之則淺矣。其論學主「尊德性」必兼「道問學」；主張治經必通史，且不忽視古人之專家著述，「其意實欲會經、史、子三者而一之」，故「凡外乎史而言經，皆無當於默深之意，此默深所以爲卓也」。而其「所謂『微言大義』者，即前漢諸儒之通經致用」。故其研經之功雖曰疏，然在實際政治之發揮應用，則遠非他儒所及；蓋欲使當時逃避於考據之壅情者，皆變爲達情之人。魏氏之論學所以主融經、史，會漢、宋，即主漢、宋兼採，古今並重者，目的乃在求一有用之通儒，惜其猶未能擺脫乾嘉遺躅及時局之限制，故有志而無業、有端而無緒、門牆已樹而百官美富未見，蓋規模雖粗立，

以明國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邊防。凡此數學，魏氏或倡導之，或光大之。匯衆流於江河，爲群望之所歸。豈非一代之大儒？新學之蠶叢哉？……王靜庵先生……謂晚清學術，實啓於龔、魏。……魏氏之學術地位不明，烏足以論列近百年來學術之源流乎？」齊氏此說實抄龔並刻意更改「誤讀」王國維之論而成，並首先將龔、魏分開論列，而排除龔自珍，並特別突顯魏源的學術地位者，文見〈魏源與晚清學風〉，頁193-242。

^④ 錢穆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529-532。

而實際成效則未彰也。錢先生又以爲魏源之學，前後三變：首由宋學入而志在經世，是爲「儒學」；次則獲聞考據訓詁之風，由「儒學」而轉入「經學」，然猶未忘儒學經世之志也；三則晚年未能沉潛以求，退默以成，於是因內心之疑惑而移情於老、釋，是爲「雜學」之歸；以爲兩者有助於養心、治事而至於救世，晚清佛學之盛行，亦與其所主相關。錢先生的結論是「默深所志，乃在通經、史，融漢、宋，會古、今，而又情切於當前之致用。凡其獲得當時交遊間之欣賞讚譽者，終限於經學考據與經世實用之兩途。其閱識孤抱之較深入者，急切未得他人之共解，……清末民初，不論主今文或古文，除經學外惟佛學，……如默深中年以前想像之通儒境界，則音沉響寂，終無嗣韻。及胡、陳『新文化運動』起，主張『全盤西化』，則佛學、經學，亦一掃皆空，更不論儒學矣。然自龔、魏下迄胡、陳，其意皆主經世，則經世之學，又豈易言哉！」^④錢先生肯定魏氏「儒學」經世之想，而惜其因時代所限與學術之粗疏，以致有志未伸，改變學風與開創學術新局之期望成空，終未能有救於國運民生，此意頗與王國維之慨嘆相近。

《魏源的政治思想》是翁瑞廷完成於一九八三年的博士論文，其書亦於當年出版。此書主要以「經世與變革二方向」做爲思考基點，探究魏源政治思想內涵與所以形成的內外緣因素，並試圖闡明其對晚清實際政治運作所發生之影響，以求「對魏源政治思想有較完整與清晰的認識，以覘其在晚清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翁氏認爲魏源代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篇》以後，開始「留心時務，志在用世」，故其「政治思想最主要是展現在其經世致用之學」上。書中除生平家世與時代背景的一般性介紹外，首先討論形成魏源政治思想的外緣因素，即當時知識分子不滿於考據之學，認爲其不足以解救日益衰頹的政治之因素。其次探討對魏源政治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術淵源與前輩學者，亦即「論魏源與十六、七世紀政治思想家的關係」。翁氏

^④ 錢穆先生：〈讀古微堂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5冊，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年），第22冊，頁445-462。另外錢先生有關「儒學」有經世之內涵，「經學」純爲考據訓詁之觀點，係錢先生之個人定義，或猶可商榷。實則兩者皆以經世爲目標，只是學科內涵有別而已，稍舉一例明之，如：董仲舒、揚雄、王守仁等爲「儒學」家；鄭玄爲「經學」家，因有《詩箋》與《三禮注》等解經之作故也。朱子則不僅爲「儒學」家，亦爲「經學」家，因爲朱子除《太極圖說解》、《通書注》、《近思錄》外，還有《詩經》、《易經》等詮釋經學之著作故也。錢先生又有經學的見解「即『訓詁考據』的見解，即誰解釋書本對的見解」的說法，見〈漢學與宋學〉，《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冊，頁572-573。

以爲魏源治學以「經世思想」爲主，思想來源甚爲龐雜，諸如《五經》、諸子以及釋、道思想等，都是孕育其政治思想的根源；主要影響的學者有顧炎武(1613-1682)、唐甄(1630-1704)、陳宏謀(1696-1771)、陸燿(1723-1785)等人；其次則王鳴盛(1722-1797)、趙翼(1727-1814)、錢大昕(1728-1804)、章學誠(1738-1801)、汪中(1744-1794)等人。並經由必要的論證，指出魏源對乾嘉學者中具有「以史經世」思想者的推重，以及其「重新評估史、子」思想的來源。第三章探討魏源變法、改革、防衛、師夷等「經世思想」的基礎與意涵。論證方式是從魏源學術思想的基礎出發，依次探究魏源的「天人並重的天道觀」、「重實踐的認識論」等「經世思想」的理論基礎；接著分析魏源經世思想中的「道德與世功相結合」、「學術與政治合一」、「人才之意涵與才能的發揮」、「詩、禮、樂合一爲達致政教教化理想的詩教觀」等經世思想的實際內容，以見魏源「欲匡時去弊」，而以三代爲其理想政治典型的經世思想之終極目標。第四章探討魏源承襲中國傳統思想中的變易觀念，形成具有「歷史進化」觀點的思想，並因此而主張變法的「變革思想」的背景與內涵。於是分析魏源不受《公羊春秋》所限、重視董仲舒尤過於何休的「今文學」立場；反映治法由質而文的歷史進化論，與由神治轉向人治的螺旋形向後發展的反本復始循環的三統三世運會說；重視歷史由王道轉向霸道，終至霸道亦亡的起伏變化現象，並觀察《詩》表現的治亂興亡變化，因而可以「知幾與反」的時變觀；以及深受《易經》陰陽相生相剋、相反相成道理之影響，而做爲倡導學習西方知識等諸般改革意見先導思想的變易思想等等內涵。第五章〈結論〉則翁氏從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角度，認爲魏源的思想係承襲清初經世之學而來，此其所以編輯《經世文編》之故；再從思想的外緣因素觀察，以爲魏源承襲知識分子不滿乾嘉考據學派，認爲其不足以挽清代日益衰頹的政治觀點，因而秉承傳統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感，企求學術與政治合一，希望以此奠立學術基礎，重建清初的經世之學，以挽救清代此種積弱不堪的實況，重新恢復清初的盛世風貌。翁氏之分析又認爲魏源的政治思想，因爲深具傳統士大夫的憂患意識，故在政治社會出現深刻危機的時期，經世致用的觀念就會適時的出現，這種反應實際上是儒家外王用世精神所塑造而成的。而遠在鴉片戰爭之前，魏源的經世思想已具規模；嘉、道之後政治不良的刺激，更是其憂患意識的主要來源，這也是影響魏源經世思想產生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翁氏總結前述探討魏源政治思想內涵的結果，以爲可以分成「經世」與「變革」兩方面的思想，並將「經世思想」歸納爲前述第三章「天人並重的天道觀」等五點；「變革思想」亦歸納爲前述第四章「三統三世運會

說」等五點，並認為二者息息相關，蓋因經世而需要變革，亦因要求變革而圖經世故也。並以爲在晚清的政治思潮中，魏源的「經世思想」與「變革思想」，確實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黃克武(1957-)的碩士學位論文《《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完成於一九八五年，此書旨在透過分析《皇朝經世文編》中有關「學術」與「治體」兩部分的文章，以探討道光時期「經世思想」的基本內涵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首先分析「學術」與「治體」這兩部分文章共同關心的主要問題，以及對此問題所提出的解答。其次則以「知識的來源」、「現實世界的基本組成與活動」、「目標」、「對歷史的看法」、「濟世之策」、「經世思想家對目標、障礙和濟世之策的綜合評估」等項，描繪出道光年間「經世思想」的基本內涵。接著作者探討了諸文的思想特點，結果認為當時思想的特點，乃是以重視現實問題，並逐步改良的思想傾向爲主流；而重視理想並要求徹底改革的思想傾向則爲伏流，亦即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特點是：一方面肯定現實的狀況，並針對各種缺失作必要的調整；另一方面則具有超越現實的理想，希冀能夠徹底改造世界。論文最後的展望：黃氏認為道光時期經世思想的基本內涵與特點，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價值取向的重要部分，許多知識分子帶著這類價值取向走入現代化。如果能夠透過相同的架構，分析現代化思想的內涵與特色，則就有可能更深入瞭解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連續性關係。

林盛裕完成於一九八七年的《論魏源與佐久間象山的海防思想——兼論十九世紀中葉中日兩國的海防暨海防思想（一八四〇—一八七四）》碩士論文，除〈緒論〉與〈結論〉外，書分三篇六章，探討的內容除魏源與佐久間象山兩人的生平、經世思想、鴉片戰爭的刺激；十九世紀中葉中、日兩國的海防與海防思想；兩者海防思想內涵的分析等三項主要議題外，並討論當時兩國的海防整備實況與其他海防論者的思想，最後並就兩者的海防思想加以比較。第一章有關魏源生平與學術背景，主要參考王家儉《魏源年譜》與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而成。第二章討論佐久間象山的生平和「一以程朱爲準」的學術認同，以及「用於社會、尋求日本獨立自主」的「強兵富國」的實用經世思想。第三章討論清末因應外來侵略而缺乏連貫性的海防建設；以及在外患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丁日昌(1823-1882)、沈葆楨(1802-1879)、李鴻章(1823-1902)等逐漸接受西方科技優勢的海防思想。第四章探討日本德川幕府末期與明治初期的海防建設與海防思想。第五章討論魏源與佐久間象山的海防思想，首論鴉片戰爭戰敗對魏源的震撼與刺激；次論《聖武記》與《海

國圖志》中「有海防、無海戰」的「守」（議守）、「戰」（議攻）、「和」（議款）等三策，互為運用、互為配合，而以「守策為上」的理論。三則分析魏源對西方的認識，雖受不懂西文與未出國門的先天限制，對西洋的社會、政治、學術與科技等因而無法深入，但對西方風俗民情、地理形勢的認識，實為中國「知西學之始」，對爾後西學之研究，奠定了基礎。四則探討魏源對國內改革的意見，主要有：掃除鄙視夷人的觀念、海運與海防一元化、除舊用新的人才政策、嚴禁鴉片等。第六章討論佐久間象山海防思想中以「力」之大小，而決定「戰」或「和」、由「守」轉為以「戰」為先的攻擊理論；以及師夷長技之法和對內部的改革意見等。〈結論〉比較兩者的海防思想，認為兩者皆生活於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侵略的時代，且都意識到應該重視海防與船堅砲利，在當時兩國風氣未大開，且「仇夷」情緒甚囂塵上的情況下，兩人居然敢公然提倡重視甚至讚美西方知識的言論，雖然主要是以器物技術的模仿為主，但此種勇氣與見識，實在值得欽佩。唯兩者雖同受鴉片戰爭的刺激，同樣提出自造軍艦、火器與建立海軍的主張，然而程度與途徑卻頗不相同，例如：在海防上魏源講內河戰術，故以「守」為主、佐久間象山主張外海戰術，故以「戰」為主；認識西方上，魏源較重視西方地理情勢與對西方國情的理解和分析、佐久間象山則注重西方科技的研究。其次比較十九世紀中葉中、日兩國的海防與海防思想，以為當時中、日兩國的海防與海防思想，大抵受到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和佐久間象山「東方道德、西方藝術」思想的極大影響。最後指出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主要在吸取船堅砲利與認識西方地理，對於如何融合東、西方的社會、文化、科技等問題，並無明確體認，故而造成爾後中國的海防運動無法精實、「中體西用」中容納西洋科技無所適從等的後遺症；佐久間象山的「東方道德、西方藝術」思想，則是標榜東西兼半的折衷思想，所謂「東方道德」即指日本傳統固有的政治、文化，所重視者實欲經由西方藝術的獲得，以肯定日本的政治、社會體系，此種觀念導致日本吸收西洋的軍事科技時，皆能以實踐的精神全力以赴，所以能夠成功。但此種「和魂洋才」思想，卻也同時喚醒了日本固有的武士的侵略性格，並異化成為日本後來對外侵略的基本因素。

林美蘭完成於一九九三年的《魏源《詩古微》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書中〈前言〉即引錄齊思和「能施之於實行，不徒託諸空言，不愧為晚清學術運動之啓蒙大師」之說，並肯定「此絕非溢美之詞」，此可判斷其研究態度趨向齊氏的取向。是書寫作程序，首先考訂魏源的生平、著作與學術淵源，引李瑚(1926-)之論，謂

《詩比興箋》係魏源作而贈予陳沆(1785-1826)者。第二章論《詩古微》的成書動機、版本及內容，謂：發揮微言大義、恢復西漢以《詩》諫世傳統二者，為《詩古微》之寫作動機，目的則在為其「改革」的政治主張尋求理論根據，至於影響魏源治《詩》最大者，則為胡承珙(1776-1832)。第三章則探討《詩古微》所論齊、魯、韓、毛等四家《詩》之異同，並尋找三家散佚的脈絡。議題涉及《詩序》及其淵源、四始與六義、美刺與無邪、四家解說歧異之實例等，最後稱美魏源捐棄家法，溝通四家，乃發揮《詩》之原旨、發揚《詩》之功能，魏源此種「前進」思想，非一般拘泥無知的時人所能知，因而難獲贊同。第四章乃討論《詩古微》對衛宏《詩序》、鄭玄(127-200)、程大昌(1123-1195)、陳啓源(?-1689)及歐陽修(1007-1072)、朱熹(1130-1200)、何楷(1600?-1646?)、顧炎武(1613-1682)、姜炳璋(1754前後)、戴震(1723-1777)、阮元(1764-1849)等前賢詩經學或與《詩經》相關論述之批評，以為魏源未能擺脫今文學立場，所評多曲護三家，所說因而難以令人信服。第五章則分析《詩古微》利用歷史、地理、禮俗、樂章、名物制度等之考證，以闡揚微言大義的方法與內容，以見《詩古微》對《詩》義的闡發。謂魏源主張的「周召分陝在武王之世」、「西周末鄭桓公滅檜」、「東周初鄭武公虢」、「獾狁熾於周夷王時」、「〈采薇〉、〈出車〉、〈六月〉三詩為宣王時」；根據地理考證謂〈泉水〉、〈竹竿〉、〈載馳〉三詩為許穆夫人所作；另外關於周室始祖時世、文王受命稱王、周公攝政之年、宣王征戰外夷，以及邶、鄘、衛、邠國、〈東山〉、〈楚丘〉、〈終南〉等歷史事件與山川地理的研究成果；至於四季均可嫁娶、男女婚齡、禘禘之祀等禮俗的結論，以及〈大武〉、〈狸首〉、〈九夏〉等樂章諸說，皆有前儒所不能道者。至於以「芣苢」為臭草、以「甘棠」為大樹；辨「其車三千」為七萬五千人、「公徒三萬」為方伯二軍之數、「元戎十乘」為先發之前鋒；論私田十取一之「徹法」與借民而耕之「助法」並行、孟子所述「井田制」為早期之制等，則亦可別存一說。第六章作者針對《詩古微》有關詩樂關係、世次說、霸者陳詩說、比興說、美刺說等自相矛盾的觀點，加以分析批判。以為其「《詩》全入樂」、「《詩》教與樂教合一」、「《詩》篇世次說」、「霸者陳詩」、「唯句首有比」、「興亦取義」、「以美次說詩」等皆有可議之處。〈結論〉則以為《詩古微》一書，旨在發揮今文學諫書傳統，以達通經致用之目的，然以講微言大義，不免有牽強附會、前後矛盾處；其說《詩》雖亦能超脫家法之束縛，使今文三家與《毛詩》同列的平等見解，然其論述《詩》義，「實乏健全

而完整之體系與見解，空有高論，苦無相應之說」，此係《詩古微》最值得商榷者。

方淑妃於一九九五年完成《魏源史學研究》碩士論文，文中除一般性的生平與學術淵源背景的敘述外，首先分析《聖武記》、《道光洋艘征撫記》、《海國圖志》、《元史新編》等四書的內容與史學價值。次論魏源以變易觀為中心，因而形成的「歷史進化論」與「歷史循環論」的史觀；並分析魏源對此「變」的史觀原動力的解說，有自變、對立、聖賢、情欲等諸說，唯魏源則以為諸動力中的「歷史自變」之力為最大；接著探討「歷史進化」的朝向由私而公、達便民、反復古、崇變法等方向的發展；以及受三世說影響產生的「歷史循環觀」，其中所蘊含的三世氣運、治亂循環等內涵。最後總結魏源的史學特色，以為有：經世致用的史學目的論、求真求實的治史態度、忠於事實的直書精神、平等對待外族的獨特史識、國與史相依存的重史主張、以經為史的融貫與發揚（繼承與發揚「經學即史學」的觀點）、大量應用比較方法的研究方式、歷史地理學的重視、博訪史料文獻蒐求方式等九項。魏源史學相關的內涵，經由方氏的歸納總結，大致都已經觸及。

賀廣如完成於一九九八年的博士論文《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一書，該書論點頗有與劉師培之論相近者^④；又頗受前述錢穆「以史為尊」觀點之影響。書中主要以參考錢穆觀點而設定的早、中、晚三期思想發展及該時期著作，以討論魏源在不同時期的關懷與詮釋的內涵，早期表現的是「憫時救世」的思想，以《老子本義》為討論中心；中期表現的是「通經致用」的思想，以《詩古微》為討論中心；晚期表現「時勢自變」的思想，以《書古微》為討論中

^④ 劉師培在〈辨魏氏之說不可從〉中批評魏源於數千載之後，深文周內以咎古文，實乃愚惑誘過之行；又批評魏源「以時代區學，不以派別區學，一若西漢之學，均屬相同；東漢所行，則皆古文之學」。最後論魏源致誤之由曰：「蓋魏氏之學，長于史而短于經。壯年之時，以經濟之學自負，習為縱橫捭闔之談；迨及晚年，其說不售，乃退而治經。然聲音訓故之學，既味焉不知；於典禮之學，又厭其煩難，唯今文之學，易於蹈空，且擇術至高，又有莊、劉諸儒，為之先導，乃顛倒群經，濟以博辯，故並今古文之同異，亦析之未明，乃欲假西漢經學之名，以凌駕戴、王、惠、段，妄謂西漢之學勝於東京。……至魏氏以西漢微言大義墮於東京，蓋以古文專詳訓故，無微言大義之可言，不若今文通經致用。則又拾宋氏（宋于庭）之餘唾……此非魏氏特創之說也。」見《左龔外集·清代古文辨誣》，收入《劉申叔遺書》，下冊，卷4，頁26b-31b，總頁1386-1389。其中以通經致用為唯一考慮的大前提，刻意混西漢之學為一的說法，賀廣如之主張與之頗為相近。

心；〈附錄〉則探討〈默觚〉的著成時代。此書由於研究視野不同，所論因而能在「生命歷程」、「學術淵源與發展」、「著作考述」、「經世實務」、「今文學派」、「史學思想」、「面向世界」、「對外影響」等爛熟的研析俗套之外，另從探討魏源終生關懷的學術內涵入手，並將其思想取向與深度，放在當時的學術環境中加以考量，經由此種動態的研究，因而發現魏源以「經世」為大前提，故解經真正的企圖實在於「通曉傳統經典中的要義，以供世之用」，其自始至終最關懷與專注者，恆在「對傳統經典之詮釋」，從而分析論證出此種關注，乃其「從事各種『經世濟民』事業的原動力」的新見；並因而能見證出前人研究上的限制，釐清魏源因「經世實用」的目的導向性過度強烈，以致考證粗疏，好於異中求同，融於一爐，甚至強將三家《詩》視為一家，不但忽略三家分立的歷史事實，同時也使不少研究者，誤認其因主張今文學而排斥《毛詩》，而不知其所指斥者乃衛宏與鄭玄；同樣的誤解也出現在《左傳》上，魏源所斥者乃劉歆等而非《左傳》本身；魏源所重視者實在西漢之經學，以其超越於東漢而加以推崇，固非僅為某家某派爭地位。賀文雖研究視野有別，然在〈緒論〉稱美魏源作為地方官、作為幕僚人員、作為大時代的一分子、作為傳統文士等方面的表現特色，尤其作為幕僚人員，所謂「淋漓盡致地發揮了經世長才，……處於內憂外患的道、咸之際，他冷靜且理性地面對原本毫無所悉的西方世界，努力介紹並分析世界局勢給坐井觀天的國人，以期突破一般人的閉鎖心態，迎頭趕上西方的船堅砲利」等等之論^③，可見研究之「前預設」實亦不脫齊氏與王氏所論的精神範圍。另外因出版較遲，故佔有「後進的優勢」；且又比較具有「整體觀」的研究態度，因而能夠見出前賢在某些取材上或研究上的問題，例如：辨明《老子本義》的〈序文〉、《本義》成書在前，四篇〈論老子〉成書在後；指正王家儉、黃麗鏞、林美蘭、趙制陽等人，錯將《古微堂外集》中的〈詩古微序〉一文，當作二卷本《詩古微》初刻本原〈序〉之誤；舉證以明《海國圖志》確為魏源所作，以釋作者之疑等等^④，這也是值得提出的研究成績。

彭明輝（吳鳴，1959-）於二〇〇二年七月出版《晚清的經世史學》一書，此書旨在尋找中國現代史學的傳統源頭。書中有二處論及魏源史學，分別以「經史並論

^③ 見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頁1。

^④ 相關論述參見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頁48-73、頁100、頁206等處。

中西宏通」和「魏源的《海國圖志》及其經世思想」作為標題。兩處內容主要在討論魏源的經史之學及其引發的學術關懷。書中以爲晚清史學有：「經今古文之爭」、「當代史的修纂」、「外國史地引介」、「邊疆史地研究」、「重視歷史教育」等五個主要研究範圍，魏源則除「歷史教育」一項外，均有觸及，故是晚清最具代表性的多面向學者。其治學出入經、史之間，而以史學著述爲中心，最終則皈依在經世致用上，可說是一種「喻史以經世」的學問；魏源在經世治國的前提下編纂《聖武記》，希冀喚醒當政者重振開國雄風，雖未成功，卻開啓清人研究本朝掌故的風氣；鴉片戰爭後發現傳統典章已不足以自救，因而轉向西方取經，《海國圖志》呈現的意義，即關懷現實的學者，開始走出書房，以西洋人的眼光來談西洋，開啓研究世界史地的風氣。《元史新編》則是結合經世與考據而成的著作，此種關懷現實的經世史學，不但是晚清史學發展的基本取向，同時也爲《元史》開啓研究的新方向；《元史新編》中運用的西人文獻資料，雖然還不夠高明，但也爲後學者打開另一扇研究《元史》的新窗戶。結論是：「魏源的經世思想、考據和史學體例之創新，爲晚清史學開啓新的契機，從而使得考據與經世不再有難以逾越的鴻溝。……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成爲晚清知識分子面對西力入侵的基本論點；……魏源亦因此成爲晚清史學發展的關鍵性人物。」⁴⁵彭氏強調的是魏源經世史學的影響與價值。

文學藝術方面的研究，專文討論魏源文學者，僅見張達人與辛金順兩人的文章，張文僅是一篇簡略的紹介文章；辛文以分析十首〈江南吟〉爲主，兼及魏源的文學觀，寫作固然較爲專業，然由於受到「五四」以來長期瀰漫在文學界「實用主義」的無形影響，因而特別肯定那種「揭瘡疤式」，對政治現實譴責內容的表現，即所謂「對人間苦難的關切」的作品，所論實以「文學表現內容」的思想觀點方面之分析爲主，至於「文學如何表現」的藝術手法或技巧方面的探討，則尚有待更進一步的加強⁴⁶。目錄版本方面的專文，張惠淑有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九二年臺灣、大

⁴⁵ 參見彭明輝：〈經史並論中西宏通〉、〈魏源的《海國圖志》及其經世思想〉，《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頁125-145、頁190-199、頁288-289等處所論。

⁴⁶ 見張達人：〈魏源——清季邵陽詩家〉，《藝文誌》第159期（1978年12月）及〈清季邵陽詩家魏默深（魏源1794-1857）〉，《湖南文獻》第7卷第4期（1979年10月），二文實係雜文，且爲內容相近之文稿；又見辛金順：〈魏源的經世文學觀與〈江南吟〉十首探析〉，《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9期（2003年6月）。

陸及日本研究論著目錄之作；王家儉曾略論魏源的著述、提供一九九四年在湖南邵陽舉辦的「紀念魏源誕辰20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七十六篇論文題目⁴⁷；翁瑞廷則檢討評價大陸一九八〇年代前後，所以興起魏源研究的緣故、研究的「前預設」與成果等相關的問題。翁氏以為因為推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之故，與近代改革運動有關的魏源，於是受到特別重視。翁氏強調大陸的歷史研究，通常帶有比較強的政治目的，研究者或不免會落入以馬克思的方法與觀點來研究歷史，用現代的特性來解釋過去的「現代關聯性」；以及用階級的觀點，解釋史料和闡釋理論的「黨性原則」等的束縛。翁氏對大陸學者的批評，包括：將魏源歸入「地主階級」的詛誤，不知魏源具有強烈的反侵略愛國思想，充滿了民族自信心，提出的主張完全是發自內心的傳統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之發用，批評魏源的制夷主張「是為了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是出於鞏固清朝封建統治的需要」，實在大錯特錯。魏源「向西方學習」的改革內涵，包括有「物質層」、「制度層」、「心理層」等三個層次，此與後來「洋務運動」的專重「物質層次」改革不同，更有別於大陸「四個現代化」僅重視「物質層次」的目標，以現代的改革相比附，絕對是個錯誤。魏源的哲學思想中，唯物論、唯心論、辯證法、形而上學的觀點，兼而有之，存在著龐雜混亂的情況，強調魏源「具有明顯唯物主義傾向的認識論和歷史進化觀點的變易思想」、「標榜魏源的主張先行後知與不行則不知」、「思想中包含有辯證法的因素」等等說法，實際上是一種選擇性的利用⁴⁸。翁氏認為魏源基本上是個儒家，思想中充滿許多「唯心」、「尊天」的思想，他的禦夷和師夷主張，固有其時代的局限性，大陸學者強烈「史為今用」的研究方式，為自己設置了許多無形框架，造成對客觀歷史事實正確認知的障礙⁴⁹。翁氏又為文評介美國學者Jane K. Leonard (1939-)的*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一書，其中特別提到此書能夠注意到有關十九世紀對外關係的研究中，長期以歐洲為中心和過度重視西方反應的不適當性；肯定Jane K. Leonard以《海國圖志》中有關南洋的撰述，重新整理傳統中國對外政策的思考等等，都是值得相關研究者更進一步的探

⁴⁷ 王家儉：〈魏源的著述及影響〉，《湖南文獻》第15卷第1期(1987年1月)及〈「紀念魏源誕辰20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9期(1995年3月)。

⁴⁸ 按：魏源具有「變易思想」是個事實，似不得指為大陸學者的刻意強調。

⁴⁹ 見翁瑞廷：〈中共對魏源的研究與評價〉，《中央月刊》第15卷第5期(1983年3月)。

討^{⑤0}。

上述的簡略論述，大約已將臺灣學者有關魏源研究較為重要的成果，做了一些必要的說明與評論，應該有助於讀者對相關研究的更進一步理解。

四、結 論

有關臺灣學者對魏源學術地位與成就相關研究的實際內涵，經由上述簡單的歸納、分析、討論，大約可以總括為：生平家世、時代背景、著作考述、思想淵源、思想形成與轉變、思想內涵、經世實務、今文經學派、學術貢獻、學術定位、影響與價值、文學成就、研究概況等幾個方面，研究涉及的層面可說相當廣泛，不過比較集中的還是在有關政治、經學、史學、思想等部分的探討，其中某些研究者，如王家儉、翁瑞廷、賀廣如、彭明輝等，均有比較深入或創新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別注意。另外除前述學者的研究成果之外，還有少數私以為值得再加商榷的問題，似乎並沒有獲得應有的注意，現在謹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魏源在現代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學術地位，然而也可以發現研究者所關注的是「經世致用」意義下「儒者」魏源的學術地位，並非魏源的整體學術成就。根據實際呈現研究成果的觀察，除生平交遊、時代背景、思想潮流、思想淵源與思想內涵等一般性必要的描述外，現代學者所關懷的大多不出其經學、史學、政治等方面的成就或影響，這些成就或影響一再的被複製、被渲染而接近神話化^{⑤1}，至於其他諸如：佛學思想的相關研究、文學的相關研究^{⑤2}、經世主張與

^{⑤0} 見翁瑞廷：〈書評：Wa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d, by Janc K. Leonard〉，《漢學研究》第3卷第1期（1985年6月），頁375-379。

^{⑤1} 例如蔣國保等就曾批評現代某些學者「在評價上拔高了」魏源有關主張的近代價值與近代意義，參見蔣國保、余秉頤、陶清等：《晚清哲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35-36；又如翁瑞廷在學位論文中，除前文所提及的美稱外，還一再宣稱魏源是「首倡經世學風」、「開學術領導政治之風」、「政治思想史中的一個締造者」、「開啓經世之學之風」、「（晚清）自強運動及變法運動乃受魏源思想之激盪而起」、「在史學上之建構，……龔自珍所望塵莫及」、「諸般改革意見，皆能切中時弊」、「奠定了清代今文學的基礎」、「首開晚清變法之風氣」、「近代變法思想的先驅」、「上承清代的前期思想，下開晚清的經世學風」、「《元史新編》體例特出，是近百年改著《元史》第一家」、「禮佛，實亦開晚清思想家的先驅」、「最傑出的政治思想家」、「主張裁減冗員老弱，……這種觀念在近

實際政績的關係等方面，則或缺乏深入的研究者、或沒有真正的研究者，然則臺灣學者何以幾乎都被限制在此一研究範圍內，而沒有形成比較寬廣或整體認知的研究視野？這些問題應該值得再加探討。

- 二、清代的士大夫群體，曾在不同的時期出現推崇龔自珍與魏源的「龔、魏並稱」一類的敘述，這類不同人物與不同時期的士大夫所謂「龔、魏並稱」的內涵是否具有一致性？又和現代學者所謂「龔、魏並稱」的意涵，是否具有一致性？這應該是個值得仔細探討的問題，然而引用此觀點討論的研究者，似乎從未關心過，好像這是一個已經有確定答案的問題了，真的是如此嗎？再者「龔、魏並稱」的學術評價，何時變成「獨重魏氏」的學術評價？促成此一學術評價轉變的判斷標準是什麼？影響此一轉變的關鍵性人物是誰？何以能夠被多數現代研究者接受？這些似乎也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 三、王國維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中提出「清代學術三變」的觀點，並論及各期的代表人物，王國維此一未經詳細論證或檢證的觀點，其學術判準是否毫無爭議？是否還有其他可能性？此一觀點對清代學術研究的影響狀況如何？影響所產生的後果又如何？這應該也是可以再加探究的問題。
- 四、不少研究者都特別強調魏源在學術研究或經世主張上「首開風氣」的貢獻，然則學者根據什麼理由，經過什麼分析論證，斷定某些重要的研究焦點或主張確實係由魏源「首開風氣」，而非他人的意見或當時士大夫群體的「當代共識」？

代中國實無人出其右」等等，文見《魏源的政治思想》，頁22、頁52、頁61、頁70註28、頁155、頁158、頁190、頁208、頁210、頁212、頁214、頁222註23等處。此種「目中無他」的論述，似乎魏源是晚清學術界「唯一」的「太上指導者」或「學術皇帝」，整個晚清的思想與學術，若無魏源出現，則真的要「千古黑暗」了。另外還有不少像前述的洪棄生一樣，認為如果能早點接受魏源的觀點，中國就可以不必受到列強的侵略或甚至可以成為列強之一等等，這類具有豐富文學想像力的建構性論述，雖是隨處可見，然求其實，則可說皆是「後見之明」一類無法實現的「書生意見」或「虛假想像」而已。

- ⑤ 論及魏源詩文章者，如民國前後的劉師培論其文，雖有「刻意求新，故雜奇語，以駭俗流」的負面評語，然亦有「明暢條達」的正面評價。見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左龔外集》，收入《劉申叔遺書》，下冊，卷13，頁4a，總頁1648。清末的譚獻則謂其有意為「雄奇之文」；並批評魏源之文「貌為閎肅，中實枵然，且令人驟不得事之本末」。見《復堂日記》，卷5，頁124。大陸學者除鄭紅群有研究魏源詩作的學位論文：《起視萬花開，一花一天地》（蕪湖：安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2年）外，至少還有21篇文章論及魏源的文學。

即使真是魏源「首開風氣」，則其意義何在？難道只要「首開」就自然的具有意義與價值，而不需要其他配合條件嗎？再者又如何證明魏源的「首開」與後來的「發展」或「呈現」，具有必然的關聯性？難道只要在時間序列上居先，就可以不必經過任何論證，而確定時間居後者，必然受到前者的影響或刺激嗎？這是否需要再進一步的確認呢？

五、現代學者幾乎一致性的認定魏源「激發」或「創造」了晚清的「經世」風潮？但是根據近年來相關研究顯示，實際上顧炎武強調的「經世」精神，在整個清代其實是一直存在著，乾嘉學者的研究中也依然存在，並不是如經由梁啟超等不斷演繹論述那樣，考據學完全沒有經世的要求一般，早已失去「經世」精神。只不過乾嘉學者表現「經世」精神的方式，主要是當時國家承平，所以針對的議題，大致是日常生活的禮儀或國家相關行政制度等的討論，因為太過普通而不具有像晚清一樣，面對外來侵略威脅的刺激性效果，所以長期以來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甚至沒有人真正的加以研究而已⁵³。如果此論可以成立，則是否可以反過來證明是晚清的士大夫群體早已存在或重新燃起的「經世」風潮，造就了魏源的名聲與地位，而非魏源「激發」或「創造」了晚清的「經世」風潮⁵⁴？這應該也是可以再加商榷的問題。

⁵³ 參見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張麗珠：《清代義理學新貌》（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張麗珠：《清代新義理學——傳統與現代的交會》（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等書的相關討論；又周好：《中國近代經世派與經世思潮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書中舉戴震、錢大昕、汪中等為例，證明「即使在乾嘉考據學鼎盛的時代，第一流學人也始終不能忘情於『經世致用』。」見頁31-33。

⁵⁴ 例如可以做這樣的提問：到底是魏源的《皇朝經世文編》與《海國圖志》激發了士大夫「經世」與「認識世界」的狂熱？還是當時士大夫處在狂熱的「經世」狂潮下，魏源的兩部書正好適時提供了那些相對「知識貧乏」的士大夫們，一個符合當時士大夫群體心理需要的「認識世界」與「經世救國」的合適管道？例如「以夷制夷」的觀點，顯然符合中國傳統士大夫「文化本位」思考下的保守心理要求，當然容易受到歡迎，此點也正是朱維鈞先生等所以批評魏源「媚清」或「媚俗」的緣故。羅志田與葛小佳就認為「『師夷』這一觀念在鴉片戰爭時即已提出，但並未充分引起時人注意；到左宗棠那一代人，讀了《海國圖志》卻立即產生『心靈的溝通』。可知中國的社會心態到左宗棠那一代人纔有一個大的轉折。心態轉變之後，以前不怎麼引人注意的觀念就突然有了市場，故得以不脛而走，迅速傳遍全國」。見羅志田、葛小佳：〈文無定法與文成法立〉，《東風與西風》，頁131。

- 六、研究者在論述魏源的生平經歷、交遊狀況和學術淵源、學術成就、學術貢獻等等，當然不能完全排除相識者或同道的意見，然而若整個研究的「推崇性」論述，居然僅根據其子、友朋、鄉親與同道者的正面論述，而缺乏比較有效的相對性的論證分析，以及針對反面論述資料的辯駁或說明，則在資料的使用上是否太過狹隘？研究結論的有效性與合法性，是否還要經過必要的檢證纔可以接受？如果前述的質疑，是可以被接受的合理懷疑，則被現代研究者不斷「發現」與「複述」的有關魏源「超越」的學術、思想、政治等等的觀點，到底是「歷史事實」的陳述，還是現代研究者所為的「歷史建構」？似乎也還有繼續深入探討的必要。
- 七、現代研究者多能注意到魏源《海國圖志》對日本、朝鮮等的重大影響⁵⁵，然除此書之外的其他學術著作，是否也對國外學術產生過影響？例如前述朝鮮學者對《詩古微》的推崇，顯然表示經學著作對朝鮮學者也有影響，這類相關的研究，似乎從無人加以注意，而現代學者多數都從「世界主義」的角度，以研究確定魏源的學術地位，然若欲真正瞭解魏源在十九世紀世界學術上的地位，則這類跨國的學術交流研究，應該是無法避免的研究主題。出現此種過度集中研究議題方向的問題，是否反映了現代學者過度地樂於「承襲」以往的研究方向與模式，因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發展研究的方向與議題？
- 八、魏源所提各項實務意見實踐可能性的問題；以及由於過度「實用主義」的考慮，因而可能導致的以政治功能取代學術價值評價的問題，除前述清代學者譚獻、李慈銘、皮錫瑞等的探討批評，以及現代少數學者如張舜徽(1911-1992)、路新生、劉筱紅等人之外⁵⁶，似乎並沒有引起太多學者的注意，實際上這也是

⁵⁵ 例如：林盛裕：《論魏源與佐久間象山的海防思想——兼論十九世紀中葉中日兩國的海防暨海防思想（一八四〇—一八七四）》（臺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陳明崇：〈韓儒金阮堂對《海國圖志》的認識〉，《食貨月刊》第7卷第6期（1977年9月）等。

⁵⁶ 參見張舜徽：《清儒學記》（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頁324；路新生：〈學以資治的浮蹊學風：讀李慈銘等論魏源學風〉，《探索與爭鳴》，1996年第5期，頁46-48；劉筱紅：《張舜徽與清代學術史研究》（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33-234。張氏批評魏源主張的「通經致用」、「以經術為治術」之論，「也不過是一套迂闊常談、不可能辦到的空論」。路氏贊同李慈銘「浮蹊」和皮錫瑞「武斷」的批評，認為兩者的「空疏」之譏，確實擊中魏源治學的痛處；並認為魏源固然有學術貢獻，但將學術作為政治的工

研究、瞭解與評價魏源學術者，不宜忽略的重要問題。

九、現代學者研究過程中出現謾罵指責那類反對「向西方學習」者的激烈態度，呈現出什麼樣的問題？難道研究者不可以有其他的立場嗎？出現此種「異常」的實況，是研究者研究視野的限制？是追求中國富強心理的焦慮？還是學術「霸權」心態的無意洩漏？或者「一元化」思考的無形限制？這和學術以外的其他情境是否有關？這些應該也是值得再加商榷的問題。

十、許烺光(1909-1999)從親屬關係的觀點，分析晚清以來中國推動「現代化」失敗的原因，認為主要是受制於中國人親屬內涵中的「連續性」、「包容性」與「權威性」親屬網絡的影響，使得中國社會結構不適合急劇地與過去斷裂；也使得具有共同理想的不同官員，各自組成群體而彼此無法協調結合，反而彼此削弱對方的力量，無法形成達到共同目標所需要的整體力量，終致有意義的改革歸於無效⁵⁷。這與一般檢討「向西方學習」失敗原因的理論根據稍有差別，似乎也可以借用來觀察分析魏源某些符合「現代人」需要的主張，所以無法有效執行的緣故。

以上這些問題，如果能夠解說清楚，因而作出比較有效的解決，則對魏源研究較為深入的瞭解，當會有一些實質的助益；同時對相關領域的研究，應該可以提供一種不同的思路。

經由本文的討論，應該可以比較明確的瞭解有關臺灣學者研究魏源學術的內容、成就、影響等實際的成果，以及未曾注意的闕漏所在。這些成果除對相關研究

具使用，因而強將學術降為政治的附庸與奴僕，發展到後來因而出現康有為等的「辨偽學」，利用曲解經書、捏造史實等肢解、強暴、犧牲學術的方法，以獲取其需要的現實政治利益；晚清以來學術界存在的「浮誇而急功近利」的不良學風；以及百餘年來強迫學術充當政治附庸與婢女的學風，實際上「與魏源的倡導和身體力行是分不開的」。劉氏則謂：「湖湘之學力主經世致用，而致用之途直接溝通治國之術和事功之學，……在他們的價值體系中政治原則成為衡量和制約學術評價標尺……帶來兩個方面的偏差。其一是當學術尺度與政治原則發生衝突，他們寧願選擇後者而捨棄前者，其典型便是魏源的『以經術為治術』。……經術是否有益於治道，便成為判斷經術（學術）優劣的唯一標準。其二是一旦學術與治道、事功無關，便被視為末流，而予以排斥。用魏源的話說便是『舉天下人才盡出於無用之一途』。」劉氏又說：「將學術評價標準與治術相混淆。」是「魏源學術缺陷的致命之點」，劉氏之論可以進一步補充路氏所言。

⁵⁷ 見〔美〕許烺光著，許木柱譯：《徹底個人主義的省思：心理人類學論文集》（臺北：南天書局，2002年），頁422、頁429。

者提供部分有效的資料外；同時透過本文的反思與深入檢討，也提供了未來研究可能或可以發展的方向及應該避免的問題所在，無論是對魏源本身的研究或是對近代史的相關研究，均具有實際參考、應用的價值。

臺灣學者魏源研究相關論著目錄

(1894年5月—2003年6月)

一、專 著：

-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臺北：精華印書館，1963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4年；臺北：大力出版社，1984年。
《魏源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
翁瑞廷：《魏源的政治思想》，臺北：聯亞出版社，1983年。

二、學位論文：

(一) 直接的論文：

-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63年。
翁瑞廷：《魏源的政治思想》，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3年。
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林盛裕：《論魏源與佐久間象山的海防思想——兼論十九世紀中葉中日兩國的海防暨海防思想（一八四〇—一八七四）》，臺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
林美蘭：《魏源〈詩古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方淑妃：《魏源的史學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改訂後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於1999年出版。

（二）涉及的論文：

周浩治：《清代之詩經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69年。

翟玉樹：《清代新疆駐防兵制的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74年。

朴海憲：《近代中韓政治思想演變之比較研究——以《三民主義》為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年。

江素卿：《論常州學派之學術特質與其經世思想》，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江俊逸：《清代反樸學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何孟侯：《何紹基及其書法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王玉華：《清代春秋公羊學之研究》，臺北：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

三、期刊論文：

胡秋原：〈近百年思想界之兩先驅（龔自珍、魏源）〉，《新中華》第1卷第1期，1943年9月。

良知：〈記魏默深先生〉，《暢流半月刊》第5卷第9期，1952年6月。

佚名：〈魏源〉，《大陸雜誌》第25卷第3期，1962年8月。

周應龍：〈魏源學案略論（附《年表》初編）〉，《復興崗學報》第3期，1963年7月。

王家儉：〈《海國圖志》對於日本的影響〉，《大陸雜誌》第32卷第8期，1966年4月。

駱雪倫：〈從曾國藩和魏源的經世思想看同光新政〉，《大陸雜誌》第36卷第1

- 期，1968年1月。
- 蕭天石：〈魏默深先生學術思想簡述〉，《湖南文獻》第2-4期，1970-1971年。
- 蔣君章：〈學術報國的魏源〉，《新時代》第14卷第3期，1974年3月。
- 孫子和：〈魏源《海國圖志》與林則徐〉，《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7卷第1期，1974年3月。
- 謝應芬：〈魏源新學思想述要〉，《湖南文獻》第4卷第1期，1976年1月。
- 陳明崇：〈韓儒金阮堂對「海國圖志」的認識〉，《食貨月刊》第7卷第6期，1977年9月。
- 張達人：〈魏源——清季邵陽詩家〉，《藝文誌》第159期，1978年12月。
- 黎德全：〈魏源思想綜論〉，《史潮》第5期，1979年9月。
- 張達人：〈清季邵陽詩家魏默深（魏源1794-1857）〉，《湖南文獻》第7卷第4期，1979年10月。
- 陳永璣：〈文化復興與武力兵學——魏源的國防思想比較〉，《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2卷第10期，1979年10月。
- 謝海泉：〈湖南先賢魏源創導海權論——並論臺灣今日應開拓海權的重要及其途徑〉，《湖南文獻》第7卷第4期，1979年10月。
- 沈慧珠：〈從曾國藩與魏源的經世思想看同光新政〉，《（師大）史學會刊》第25期，1981年9月。
- 周應龍：〈魏源學案略稿(1)〉，《湖南文獻》第10卷第1期，1982年1月。
〈魏源學案略稿(2)〉，《湖南文獻》第10卷第2期，1982年4月。
- 翁瑞廷：〈中共對魏源的研究與評價〉，《中央月刊》第15卷第5期，1983年3月。
- 王家儉：〈由漢宋調和到中體西用——試論晚清儒家思想演變〉，《（師大）歷史學報》第12期，1984年6月。
- 趙制陽：〈魏源《詩古微》評介〉，《孔孟學報》第49期，1985年4月。
- 翁瑞廷：〈書評：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d, by Jane K. Leonard〉，《漢學研究》第3卷第1期，1985年6月。
- 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期，1986年9月。
- 王家儉：〈魏源的著述及影響〉，《湖南文獻》第15卷第1期，1987年1月。

- 宋宏煦、徐定心：〈洞燭機先的魏源〉，《幼獅月刊》第416期，1987年8月。
- 王家儉：〈魏源的水利議——兼論晚清經世學家修法務實的精神〉，《（師大）歷史學報》第18期，1990年6月。
- 黃依妹：〈今文學家龔自珍と魏源の仏教信仰〉，《東方學》第81卷，1991年1月。
- 劉滌凡：〈魏默深史學評傳〉，《中國書目季刊》第26卷第2期，1992年9月。
- 王家儉：〈魏源的史學與經世史觀〉，《（師大）歷史學報》第21期，1993年6月。
- 〈「紀念魏源誕辰20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9期，1995年3月。
- 鄭卜五：〈魏源《海國圖志》中崇本務實的經世主張〉，《海軍軍官學校學報》第5期，1995年10月。
- 張惠淑：〈魏源研究論著目錄〉，《經學研究論叢》第4輯，1997年4月。
- 賀廣如：〈《老子本義》的成書時間〉，《暨大學報》第3卷第1期，1999年3月。
- 陳振風：〈魏源學治合一的思想〉，《臺南女子技術學院學報》第18期，1999年8月。
- 黃肇基：〈魏源的經世思想〉，《建中學報》第5期，1999年12月。
- 林玲玲：〈魏源與清季經世致用之學〉，《黃埔學報》第41期，2001年9月。
- 沈俊平：〈從陳澧對魏源海防思想的批評看魏氏對晚清局勢的認識〉，《中國文化月刊》第260期，2001年11月。
- 賀廣如：〈《詩經說義》與《詩古微》——論康有為的詩經學（上）〉，《大陸雜誌》第104卷第2期，2002年2月。
- 〈《詩經說義》與《詩古微》——論康有為的詩經學（下）〉，《大陸雜誌》第104卷第3期，2002年3月。
- 姜智瓊：〈魏源論「學」〉，《東方人文學誌》第1卷第3期，2002年9月。
- 辛金順：〈魏源的經世文學觀與〈江南吟〉十首探析〉，《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9期，2003年6月。

四、論文集或專書中的論文：

- 洪 禱：《寄鶴齋古文集·跋魏子默深書後（甲午四月廿一〔1894年5月25日〕夜又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洪棄生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第2冊，卷下，頁255-256。
- 錢 穆：〈魏默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下冊。
- 黃公偉：〈魏源與其「今文學」〉，《中國近代學術思想變遷史》，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6年。
- 李日章編：〈魏源〉，《現代中國思想家》（第8輯之2），臺北：巨人出版社，1978年。
- 趙天儀：〈魏源〉，《近代中國思想家》（第1輯），臺北：巨人出版社，1978年。
- 王家儉：《魏源》，《中國歷代思想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4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更新版，第18冊。
- 錢 穆：〈讀《古微堂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8），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年。
- 何信全：〈龔、魏的經世思想〉，《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
- 韋政通：〈魏源〉，《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
- 王家儉：〈魏默深的海權思想〉，《第二屆二十一世紀海權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 〈魏源的史學〉，《第二屆國際華學研究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1992年。
- 彭明輝：〈經史並論中西宏通（魏源）〉，《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
- 〈魏源的《海國圖志》及其經世思想〉，《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
- 江素卿：〈論魏源治《詩》之特色〉，《清代學術論叢》（第3輯），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

五、學術會議論文：

王家儉：〈魏源的海權思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辦：「紀念魏源誕辰2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湖南邵陽，1994年9月）。

六、報紙文章：

南湖：〈魏源論人才與國運〉，《中央日報》1961年11月5日。

王家儉：〈魏默深對於臺海地位之卓越見解〉，《中央日報》1979年2月20日。

盧明瑜：〈麥餅引出乾坤才——魏源的童年〉，《中央日報》1989年3月20日。

林景淵：〈從禁書到暢銷書——促成日本明治維新的《聖武記》、《海國圖志》〉，《中央日報》1996年2月7日第19版。